

向戰略防禦的過渡： 宋遼陳家谷與君子館戰役（A.D. 986）

曾瑞龍

美國亞利桑拿大學博士候選人

本文屬於戰役研究（studies of battle）的範疇。以往人們討論戰爭，很喜歡把國家之間的鬥爭聚焦到一兩位名將的功業上；而長年累月劇鬥的結果，也常常被形容為一兩場戰役所決定。誠如米高·霍華德（Michael Howard）指出，二次大戰時具有如蒙哥馬利（Field Marshal Viscount Montgomery of Alamein）那樣貢獻的英倫將領決不止寥寥數位，可是世人心目中卻只有一個蒙哥馬利。¹ 焦點的選擇，無疑有助於集中而深入的研究，可是只看一點有時也有偏頗之弊。並不是每一場過往的戰爭都有決定點可尋，而所謂「決定性」的內容，也不是無可爭議的。誠如曼斯坦元帥（Field Marshal Erich von Manstein）指出，史達林格勒（Stalingrad）雖然導致德國吞併蘇俄的意圖失敗，但卻未必一定「決定」了德國在整個東線的崩潰。² 隨著對戰爭研究的日漸深入，軍事史和戰爭史已被賦予新的內容。舉凡人類對戰爭的理解，戰爭的文化現象，社會、經濟轉變對戰爭的影響，過往那種僅視戰爭史為政治史的延續，及強調戰役成敗對王朝興替的作用的觀點已日漸褪色。

然而即使在新的研究趨勢下，戰役研究作為戰爭史的一個研究方向仍然擔當相當重要的角色。首先，從應用的角度來看，戰役研究與戰略理論的修訂仍存在一定關係，而

¹ Michael Howard, *The Causes of Wars*, 2nd and enl.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208-15. 米高·霍華德（著），陳奎良（譯）：《戰爭的起源》（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6年），頁241-49。

² Field Marshal Erich von Manstein, *Lost Victories* (Novato: Presidio, 1994), pp. 289-90. 艾曆·馮·曼斯坦元帥（著），紐先鍾（譯）：《失去的勝利》（臺北：軍事譯粹社，1984年），頁231。有關此項論斷之史實及論述穿插於同書後半部分，即第十二至第十五章，在此不一一盡錄。

戰略理論雖可作純學科的研究，卻多少總有規範性的意義在內。³ 因而，戰役研究的結果能間接影響一個時代對戰爭行爲的模式，克勞斯威茲（Carl von Clausewitz）對拿破崙戰爭（Napoleonic War）的研究及其發揮的巨大影響是最明顯的例子。其次，戰爭本身也是一種文化現象。由於其激烈多變的性質，使人的價值與現實、構思與運作、理性與非理性的矛盾衝突在戰役裏集中表露無遺。從其矛盾衝突的取向往往能夠發現一個文化的特徵，因此也是歷史研究的好素材。⁴ 另外，弄清戰役的史實和成敗關鍵對關於戰爭的宏觀剖析及專題研究具有不可缺少的價值。歐美各國對戰爭的研究較爲深入，其具有深厚基礎的戰役研究提供了不少便利。⁵ 職是之故，戰役研究在今日仍具意義。

宋遼戰爭是開展中國古代戰役研究的良好素材。宋遼戰爭長達二十五年，主要戰役將近十個，兩個政權都相對穩定，而且領土遼闊，兵源充足，能夠讓研究者將戰爭（war）從戰亂（chaos）中判別出來。正因如此，和平共存的機會在戰爭中始終存在，而兩國終歸和好。在這過程中，目的（ends）與手段（means）的調協爲戰略研究提供了參考。戰爭雖然仍受政治、社會和經濟條件的制約，但亦已具有相當時間、空間讓戰略互動、戰術對抗等軍事本身的課題表露其重要性。因此，應重新重視對宋遼戰爭的研究。

在宋遼戰爭史上，歧溝關之役（986）常常被看成決定性轉折點，⁶ 而稍後的陳家谷

³ 將戰略視作有規範意義的學說甚爲普遍，在某些國家的軍事術語亦得到印證。例如：“The art and science of developing and using political, economic, psychological and military forces as necessary during peace and war, to afford the maximum support to policie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probabilities and favorable consequences of victory and to lessen the chances of defeat.” (U.S. Joint Chiefs of Staff,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Terms*, New York: Arco Publishing, 1988, pp. 338-39) 有關將戰略視作客觀現象的理論，見 Edward N. Luttwak, *Strategy: 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5, 15-16, 58。又中譯本，愛德華·魯特瓦克（著），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戰略——戰爭與和平的邏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頁5，17-18及56。

⁴ Philip Contamine, *War in The Middle Age*, translated by Michael Jon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4), p. 260.

⁵ 某些學者對於歐美軍事史界好以籠統戰術原則套入古今戰例日漸感到不滿，見John Keegan, *The Face of Battle* (New York: Viking, 1976), pp. 22-26。這誠然是一個流弊。但無可否認的是，在中國古代戰役研究中縱使這種形式的戰役史也很少見。李震的《中國歷代戰爭史》（臺北：三軍出版社，1976年）是最全面的一種戰役史，但取材多限於正史，對事件異同的考證較少。

⁶ 如金毓黻《宋遼金史》（臺北：樂天出版社，1971年）有謂：「此兩役〔指高粱河、歧溝關戰役〕爲遼強宋弱之關鍵，不可不鄭重視之。」（頁31-32）周寶珠、陳振：《簡明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0；王煦華、金永高：〈宋遼和戰關係中的幾個問題〉，《文史》第九輯（1980年6月），頁83-113；此類意見頗多，不能盡錄。

之役（986），又成為楊家將系列的文學及舞臺藝術的戲劇高潮，也引起了學者一定程度的注意。可是緊接這兩場戰役的君子館戰役（987），卻完全缺乏專門研究。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謂：「初，曹彬及劉廷讓等相繼敗覆，軍亡死者，前後數萬人。緣邊創痍之卒，不滿萬計，皆無復鬥志。河朔震恐，悉料鄉民為兵以守城，皆白徒，未嘗習戰陣，但堅壁自固，不敢禦敵。敵勢益振。」⁷ 鬥志是戰鬥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儘管宋軍在979年高粱河戰役及980年瓦橋關戰役均負於遼，但士氣未見受挫。上述史料首次揭示出宋軍不但未能收復燕雲，傷亡慘重，而且士氣開始低落。所謂曹彬和劉廷讓的覆敗，是指歧溝關和君子館戰役而言。君子館戰役的重要性，從此可見一斑了。

因而從比較嚴格的角度而言，按照宋太宗雍熙三年北伐失敗後的戰情，君子館戰役在決定宋軍轉入守勢的戰略過渡中扮演重要角色。北宋不能收復燕雲，轉而在對遼戰爭中屈居下風，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對此前輩學者已作出很詳盡的討論。歧溝關之敗的戰略分析（strategy analysis）及戰役法（operational arts）運用問題，筆者已另文討論。⁸ 本文意在補充以往對君子館戰役的忽略，並深入觀察986年夏至987年春戰略形勢如何逐漸逆轉，而這項轉變又如何是一系列具有爭議性的決策所引致，從而顯示出宋軍轉入被動捱打局面並不純然是雍熙北伐一場戰役失敗的結果。將這一系列挫折認作從攻轉守的過渡階段，比視單一場戰役作為轉捩點要來得全面和客觀。

當然，要對戰役進行全面和客觀的分析，則對指揮官意圖的判定不可或缺。然而在研究古代戰役時，往往遇到有關戰役計劃的史料嚴重缺乏的問題，何況即有亦不能盡信。指揮官本人對戰役意圖的記載，因牽涉到最現實的責任問題，往往直接構成諱飾和作偽的動機。⁹ 因此，推斷戰役意圖的最後依據仍是軍事行動本身。當然，單一的行動本身不能說明其背後必有某種意圖的存在。然而一連串或一組相關的措施和行動，則純屬偶然的機會甚少，而某種程度上仍可反映指揮官的意圖。

趙翼《廿二史劄記》說治宋金戰史必須參看二史，不可偏執一端。¹⁰ 這種態度亦

⁷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以下簡稱《長編》），卷二十八，頁631。

⁸ Tsang Shui-lung 曾瑞龍，*The Defeat of the Sung Army in 986: A Strategic Review*. Paper presented at Western Conference of American Asian Studies, Tucson, Arizona, U.S.A., Oct., 1992.

⁹ 李德·哈特（Liddell Hart）（著），鈕先鍾（譯）：《為何不向歷史學習》（*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臺北：軍事譯粹社，1981年再版），頁23。

¹⁰ 趙翼《廿二史劄記校證·宋金用兵須參觀二史》（王樹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云：「兩國交兵，國史所載，大抵各誇勝而諱敗，故紀傳多不可盡信。……是各史紀載互異，若徒據一史必不能得其真也。惟此國自述其敗，而後見彼國之真勝；否則別見於他傳者，其勝敗亦差得實；又或此國敘戰勝之難，亦可見彼國拒戰之力。……故閱史必參觀各傳，彼此校核，始得其真也。」（卷二十七，頁611-13）

應當用在宋遼戰爭史上。某些研究宋遼戰史的學者曾指出，南宋至清的歷史編寫過程中常有將宋遼、宋金二史歧異之處勉強作文字上的湊合，而不去深求其事實的異同，以致某些反映事件經過的不同記載被模稜兩可的調和在一起。¹¹ 這種傾向值得注意。本文採宋遼二史、《長編》、《宋會要》等外，兼參看《隆平集》、《東都事略》及各種官私記載，以求盡量接近史事真相。

轉入戰略防禦的宋軍

雍熙北伐失敗的善後工作，表面上主要是如何收容和安置潰兵的問題；但更具深遠意義的任務，是如何將兵力布勢（deployment）從戰略攻勢轉型為戰略防禦。此項任務看似簡單而實牽涉複雜的人事調動，其中最困難而容易忽略的，是中央和戰區領導層對於戰略轉型的共識。沒有這種共識，則防禦作戰很難發揮最大效果。

宋軍在北伐中損失了大量兵員和物資，傷亡慘重，¹² 但仍保有相當精銳部隊。¹³ 北伐結束時中路田重進軍撤回原駐地定州，西路潘美和楊業所部則退回出發時的代州。¹⁴ 這兩路在連番劇鬥中雖有損耗，但未遭喪敗。即以傷亡頗重，隊列不整的東路主力，也有部分單位能完整撤回。在撤退中有突出表現的李繼隆不久就獲任命為馬軍都虞候。¹⁵

對於宋軍決策核心來說，歧溝關戰敗的打擊無疑是重大的。原本位於軍事決策核心以外的文臣紛紛向核心施加壓力，如前任宰相趙普、現任宰相李昉等都上言勸太宗弭兵息戰。¹⁶ 甚至左拾遺王化基，也乘著這個機會抗疏自薦。¹⁷ 擁有最高決策權力的宋太

¹¹ 伍伯常：〈易州失陷年月考——兼論南宋至清編纂北宋歷史的特色〉，載楊炎廷（編）：《宋史論文集：羅球慶老師榮休紀念專輯》（香港：香港中國史研究會，1994年），頁1-19。

¹² 參看《長編》，卷二十七，頁613；脫脫等：《遼史·聖宗本紀二》（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十一，頁123；同書卷八十三〈耶律休哥傳〉，頁1300。

¹³ 宋西路軍之楊業部、中路軍之荆嗣部，均為宋軍中之精銳部隊，時未達歧溝關戰場。又《長編》卷二十七記載君子館戰役時，「廷讓先以麾下精卒與滄州都部署李繼隆令後殿」（頁625），可見後來李繼隆部下尚有精卒。君子館戰後，定州監軍袁繼忠部下又有易州靜塞騎兵，「尤驍果」（卷二十九，頁658）。

¹⁴ 《長編》云：「上始聞曹彬等軍敗，乃詔諸將領兵分屯于邊，召彬及崔彥進、米信入朝，田重進率全軍駐定州，潘美還代州。」（卷二十七，頁614）

¹⁵ 《長編》云：「初，米信、傅潛等軍敗眾擾，獨李繼隆以所部振旅成列而還，即命繼隆知定州。……壬申，以繼隆為馬軍都虞候，領雲州防禦使。」（卷二十七，頁620）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二百五十七〈李處耘傳〉附〈李繼隆傳〉略同（頁8965）。

¹⁶ 《長編》，卷二十七，頁614-18。

¹⁷ 同上注，頁623。

宗受到這種論調多大影響，難以驟加斷言；但表面上他對於那些文臣的規諫，都能不失體面地應付過去。尤其是答趙普的手詔上，他解釋了北伐原不是爲了窮兵黷武，而且早已縝密的戰役部署，戰敗是由於曹彬等大將沒有遵照計劃行事，「此責在主將也」。¹⁸ 這種解釋令人懷疑他有推卸責任給曹彬的意圖，但總算維護了他帝王的體面。

與此相應的是，他作了一些「自勉詩」來賜給近臣，¹⁹ 又提拔了王化基、李沆、宋湜等賢士。甚至軍威不振，也沒有奪去他對書法藝術的興趣。他把自己的飛白書跡賜給宰相李昉，還說「此雖非帝王事業，然不猶愈於畋遊聲色乎！」²⁰

相反，對於那些曾和他一起策劃北伐的那些近臣，他曾流露悔意。《長編》記載了他在召見樞密使王顯等時「推誠悔過」的事情，但是注文中又很有保留地說此事「更當考」。²¹ 不論太宗有沒有私下向那些大臣表示悔過也好，至少在公開場合，他仍力圖低調處理，對內部的批評很從容而有禮地解釋過去，以免被視作窮兵黷武、田獵聲色之主。

他在答趙普的手詔中提到「邊防之事，已大爲之備，將來敢肆侵撓，必當盡殲族類」的話。²² 從君子館戰役之後看來，這幾乎等於一句空話；可是他隨而提拔辛仲甫爲參知政事，則多少反映出重視軍備的訊息。辛仲甫在宋初以兼擅文武著稱，同時是射箭的名家，連成德節度使郭崇也向他求藝。²³

總之，儘管歧溝關之敗在宋廷內引起一定反響，弭兵息戰之說再度抬頭，但宋太宗在表面上還能沉著應付，也沒有公然否定北伐。他對邊防人事作了一番調整，以面對契丹可能發動的入侵。

史書沒有具體記載宋軍各單位調動的詳情，不過從將領的人事調動也可以知道一部分的情況。首先是西線，自潘美奉詔退回代州，他就繼續當河東方面的主將，其麾下將佐也不見有很大的人事變動。中路的情況比較複雜。由於重鎮定州是北伐時田重進軍的出發基地，後來又成爲歧溝關下來東路潰兵的收容所，其混雜了不同系統的部隊，是可以想見了。《長編》的一條記載可以說明這種情況：

¹⁸ 同上注，頁617。又近人對曹彬的研究，見張其凡：〈庸將負盛名——略論曹彬〉，載鄧廣銘、徐規等（編）：《宋史研究論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507-27。柳立言：〈宋初一個武將家族的興起——真定曹氏〉，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中國近世社會文化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年），頁40-50。

¹⁹ 《長編》，卷二十七，頁618。

²⁰ 《長編》云：「左拾遺真定王化基抗疏自薦，上覽之，謂宰相曰：『化基自結人主，誠可賞也。』」又曰：「李沆，宋湜皆嘉士。」……庚子，並除右補闕、知制誥，各賜錢百萬。」（卷二十七，頁623）

²¹ 同上注，頁618。

²² 同上注，頁617。

²³ 《長編》云：「丙辰，以御史中丞辛仲甫爲給事中、參知政事。」（卷二十七，頁619）關於辛氏的善射，見文瑩：《玉壺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一，頁10。

及詔分屯諸軍，[李]繼隆令書吏盡錄其詔。旬餘，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按詔給卷，俾各持詣所部。上嘉其有謀。²⁴

史文以「不知所向」來形容東路敗卒的情景，似乎建制已陷於混亂。故太宗即命李繼隆知定州。²⁵ 按照軍隊編制的習慣，定州是田重進中路軍的出發基地，而田軍亦奉命撤回，那樣若以田重進兼知定州，軍政上比較容易統一；但太宗結果是讓東路軍曹彬麾下的李繼隆來做知州，而將田重進召回京師擔任馬步軍都虞侯的殊職，以賞他在北伐初期連戰皆捷，後來亦全師而還的奇功。²⁶ 相反，知定州的職位由東路軍的將領來擔任，可以有安頓潰卒之效。當時東路高級將領如曹彬等，都要赴京問話。由李繼隆暫時主理定州軍政不失為妥當的人事調動。

當然這只是權宜之計。當敗卒大體上回復編制，李繼隆的任務就結束。在這年年底之前，他被調往滄州出任兵馬部署。至於定州的大軍則依然由田重進回去指揮。²⁷ 總言之，由於東路敗卒造成的一番擾攘，需要由東路長官來善後，這使李繼隆擔任了一段短時期的知定州，但年底之前，定州的大軍又重新置於田重進的指揮之下了。

東路的關南方面，敗卒所造成的混亂沒有被詳細記述下來，但指揮階層的大調動則勢在必行。原來以攻勢為設想的戰鬥序列需要改為防守的態勢。太宗遲到六月才下達明確指示：

上慮契丹必入寇，命左衛上將軍張永德知滄州，右衛上將軍宋偓知霸州，右驍衛上將軍劉廷讓知雄州，蔚州觀察使趙延溥知貝州。²⁸

當時已是歧溝關戰敗後一個月了，這項調動才發佈，加上東路主將曹彬、郭守文、傅潛等入京待罪，一時不能回到原來崗位，以致必須重新任命一批將領。²⁹

²⁴ 《長編》，卷二十七，頁620。《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處耘傳〉附〈李繼隆傳〉略同(頁8965)。

²⁵ 同上注。

²⁶ 《長編》云：「甲戌，以步軍都指揮、靜難節度使田重進為馬步軍都虞候。自張令鐸罷馬步軍都虞候，凡二十五年不以除授，幽州之役，惟重進之師不敗，故特命之。」(卷二十七，頁620)內文提及張令鐸罷都虞候一事，即傳統所謂「杯酒釋兵權」，自此馬、步軍與殿前司為「三衙」，田重進一人兼為馬、步二司都虞候，實甚罕見。

²⁷ 《宋史·田重進傳》云：「乃命重進董師駐定州，遷定州駐泊兵馬都部署。」(卷二百六十，頁9024)

²⁸ 《長編》，卷二十七，頁618-19。

²⁹ 同上注，頁614；又云：「丙辰，曹彬等至闕。戊午，……召彬及崔彥進、米信、杜彥圭、行營都監郭守文、馬步都指揮使傅潛、押陣部署陳廷山、排陣使蔡玉、先鋒都監薛繼昭等九人詣尚書省鞠之。」(頁619)結果諸將皆受貶官處分。

張永德、劉廷讓等本是開國元勳、兩朝宿將，但久已投閒置散，忽然復起為邊防主將，是否一項明智決定，不宜妄斷。無論如何，觀諸當時及君子館戰役後的記載和評論，亦不見有將戰敗歸咎於劉廷讓等年邁者。元人修《宋史》，在劉廷讓傳論對其軍紀嚴明稱譽有加，而沒有將君子館之敗歸諸其個人過失。³⁰ 張永德的邊任後來也沒有受到劉廷讓覆敗的影響。君子館戰役後，由於知雄州賀令圖被俘，太宗改派張永德接任雄州。其後張永德遷調定州接替田重進，還兼河北兩路排陣使，而他雄州的缺則由劉廷讓補上。³¹ 劉廷讓再度接手雄州之後不久被罷免，是由於生病請假，不待批准而擅離職守就醫。³² 至於太宗對他在君子館的戰敗，也沒有大加責難，只說他被李繼隆「所誤」而已。³³ 從君子館戰役前後東線主將調動來看，似不能說太宗起用一批老將來守關南劇郡這個決定有很嚴重的錯誤。

到年底之前，關南將領又作了一次局部調動，劉廷讓調任瀛州，雄州由賀令圖接替。³⁴ 結束了知定州的任務，遷任馬軍都虞侯的李繼隆，這時便調任滄州都部署。³⁵ 這項調動重新使李繼隆成為東線主將之一。以上兩項調動的意圖不能確知。瀛州處於關南的心臟地帶，西接高陽關，南通貝、冀，位置較雄州宜於進行機動戰。歷史上，瀛州古稱河間，從來都是河朔大郡，雄州只是宋初將瓦橋關昇格而成。若太宗有意倚重劉廷讓作整個東線的主將，則將他調到瀛州是很自然的事。

可是李繼隆作滄州都部署則有些耐人尋味。滄州、景州在唐五代自成一鎮，是為橫

³⁰ 《宋史·劉廷讓傳》（卷二百五十九，頁9003）。

³¹ 《宋史·張永德傳》云：「雍熙中，連知滄、雄、定三州。端拱元年，拜安化軍節度。召還，為河北兩路排陣使，屯定州。嘗與契丹戰，斬獲甚眾。」（卷二百五十五，頁8917）按君子館戰役前，張永德知滄州；戰役中知雄州賀令圖為契丹所擒，故永德知雄州的時間應在君子館戰役後，以代替賀令圖的空缺。君子館戰役期間知定州的是田重進，故永德再調定州，乃接替田重進。雍熙四年夏田重進曾入朝，永德知定州應在這一期間，見《長編》，卷二十八，頁638。又據《宋史·劉廷讓傳》云：「四年，復命代張永德知雄州兼兵馬部署。是秋以疾聞。」（卷二百五十九，頁9003）可知張永德赴任定州後，以劉廷讓來知雄州，時間亦在秋季以前，二史所載適相吻合。

³² 《宋史·劉廷讓傳》云：「是秋以疾聞，帝遣內醫診視，因上言求歸京師，不俟報，遁離屯所。帝怒，下御史按問，獄具。」（卷二百五十九，頁9003）

³³ 「太宗知為李繼隆所誤，不之責。」（同上注）

³⁴ 「以廷讓知雄州，又徙瀛州兵馬都部署。」（同上注）可見廷讓知雄州未幾即徙瀛州。《長編》卷二十七述君子館戰役云：「先鋒將六宅使、平州團練使、知雄州賀令圖。」（頁625）則接任雄州的應是賀令圖。

³⁵ 《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處耘傳〉附〈李繼隆傳〉云：「太宗益嘉其有謀。……契丹大入邊，出為滄州都部署。」（頁8965）《長編》卷二十七述君子館戰役，亦載繼隆為滄州都部署（頁625）。

海軍，不屬盧龍節度使所管，嚴格來說不能劃入「關南」的範疇，³⁶ 故其獨立於關南（或瀛州）都部署的權限之外是有一定歷史淵源的。但問題是滄州近海，地多斥鹵泥沼，從來都不是宋遼戰爭的主要戰場，何以竟設立都部署一級的帥職？況且，既已有張永德作知州，又何須再加上一個李繼隆？宋初西北邊郡知州多兼統兵民，若滄州知事例外的只理民政，則何不派一個文官來？何須起用後周殿前都點檢張永德，即趙匡胤的前任上司來做？若說不信任張永德，而要讓李繼隆來加以監視，干脆不要讓他復出豈不更好？因此，這項調動不能單純從人事角度來解釋，而必須兼顧到兵馬調動。也就是說，這可能意味著滄州有部分兵力將從知州轉隸都部署李繼隆。至於李繼隆和張永德各自權限任務的劃分，則尚欠明朗。

另外一件耐人尋味的事情，是宋太宗起用張永德、劉廷讓，叫他們「擊虜自效」，³⁷ 而當時他們「宿將久罷節鎮」，³⁸ 又在兵潰之餘擔當重任，不得不宣力而為。可是擊虜自效的具體含義不甚明朗，同時適用於攻、守兩種姿態。換言之，我們不甚清楚宋太宗在完成「分屯諸軍」之後下一步有何打算，是進一步鞏固邊防，還是繼續收復燕雲的嘗試？然而可以確定的是，在當年的秋冬二季，宋軍並沒有完全放棄攻擊行動。換言之，收復燕雲的戰略目的在雍熙北伐中不能實現，似沒有立即帶來戰役或戰術手段的相應改變。這從陳家谷和君子館戰役可以看得出來。

陳家谷戰役

陳家谷戰役可以說是歧溝關戰役的餘波。宋軍西路北伐部隊撤回代州之際，遼就策動反攻，準備收復原來喪失的州縣。《遼史》記載西路主將耶律斜軫在五月時擊破宋將賀令圖等，³⁹ 克復蔚州（今山西蔚縣）。六月底，遼聖宗以節度使耶律毗哥，翰林學士邢抱朴為雲州宣諭招撫使。斜軫繼奏「追奔逐北，至飛狐口。遂乘勝鼓行而西，入寰州，

³⁶ 「關南」一般指石敬瑭割讓地中為周世宗所收復者，具體而言即瀛、莫二州及瓦橋、益津、淤口三關。滄州雖亦在三關之南，但不屬石敬瑭割讓地。慶曆時遼人來索關南十縣，亦不包括滄州。

³⁷ 《宋史》卷二百五十九〈劉廷讓傳〉云：「時廷讓與宋偃、張永德並罷節鎮在環列，帝欲令擊契丹自效，乃遣分守邊郡。」（頁9003）《長編》卷二十七略同（頁618-19）。

³⁸ 《長編》，卷二十七，頁619。

³⁹ 《遼史·聖宗本紀二》云：「癸未，……斜軫遣判官蒲姑奏復蔚州，斬首二萬餘級，……戊子，斜軫奏宋軍復圍蔚州，擊破之。」（卷十一，頁122）同書卷八十三〈耶律斜軫傳〉云：「斜軫至定安，遇賀令圖軍，擊破之，……遂取蔚州。賀令圖、潘美復以兵來，斜軫逆于飛狐，擊破之。」（頁1302）可知前後兩戰，賀令圖都是宋方的重要將領。同書卷八十五〈耶律題子傳〉云：「敗賀令圖於定安，……賀令圖復集敗卒來襲蔚州，題子逆戰，破之。」（頁1315）與斜軫傳同。

殺守城吏卒千餘人」。⁴⁰ 斜軫越過較近的應州，而先取較遠的寰州，控制雁門外交通要道，造成宋軍新復的雲（今山西大同）、應（今山西應縣）、朔（今山西朔縣）等州都有被切斷與後方聯繫的危險。加上宋軍西線主力已回代州，雁門外沒有強大兵力，因此上述州郡的得而復失就只是時間問題了。若宋廷能坐視各州陷沒，那麼這一仗也不是非打不可。然而宋在那些州縣都已設置了大批行政人員，還有那些曾協助宋軍攻城略地的邊民百姓，從政治的立場來看不能撒手不管。於是八月發下來的詔書，便下令「徙雲、朔、寰、應四州民，詔潘美、楊業等以所部兵護送之」。⁴¹

可是從戰略角度來看，以上決定遲至八月才作出，時間上很不適當。若要撤退四州吏民，應在夏季令田重進歸定州、潘美、楊業歸代州的同一時間進行，就便令大軍掩護吏民入塞，那樣政治和軍事的步調比較一致。但太宗卻沒有那樣做，反而讓沒有大軍掩護的四個州暴露在外。到遼軍反攻勢如破竹，才另發動一個掩護撤退的戰役。他為何作出這樣模稜兩可的措施，原因不明。也許是爲了示以鎮靜，保留一點政治籌碼；也許是還未明確轉入戰略防禦的方針；也許是還想保留一些將來反攻的據點。但無論上述哪一種情況，都說明了太宗對敗局的理解不足，對保留代北四州存有較大期望。

當西線主力已歸代州，而耶律斜軫又奪回寰州時，撤退四州吏民的風險已比原先大爲增加。爲了如此有限的政治目的，是否值得讓野戰部隊去冒日以增加的戰鬥風險，是一個問題。固然，不救四州吏民肯定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朝廷威信，但爲此而令野戰部隊承受較大的風險，似乎也欠明智。蓋言之，讓陳家谷悲劇上演的不全是一兩個奸臣庸將，宋廷最高決策要負上一定責任——不能在局勢惡化時下定撤退的決心，導致後來政治和軍事考慮的矛盾激化，左右爲難。

一支軍隊既必須在一個不利的戰略形勢出擊，那麼只有寄望於完善的戰役法（operational arts）及有效的戰術協同（tactical coordination），始可扭轉敗局。首先論戰役法方面。宋太宗並沒有爲這次戰役行動的手段下達明確指示，戰役計劃要由方面主將們開會決定。從楊業的主張，可以看到從雁門通往代北的要道不止一條，如有妥善辦法，要避免和遼軍決戰還是辦得到。楊業的計劃是這樣：「今寇鋒益盛，不可與戰。朝廷止令取數州之民，但引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雲、朔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日，令雲州之眾先出。我師次應州，契丹必悉兵來拒，即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⁴² 楊業一開始就指出戰役目標的有限性，「止令取數州之民」而不是要和契丹決戰。因此一個佯攻作戰已足以達成任務。從「引兵出大石路」和「我師次應州」來看，大石路是代州通向應州的一條小徑。楊業以應州爲虛攻目標，十分得當。因爲耶律斜軫越過應州不攻而直取寰州，雖可隔斷代北四州在外，但他本身的後路也很容易受到威脅。斜軫敢

⁴⁰ 《遼史·聖宗本紀二》（卷十一，頁123）。

⁴¹ 《長編》，卷二十七，頁621。

⁴² 同上注。

於大縱深切入，可能是看到宋人在代北已沒有主力部隊。但楊業兵出應州的話，他爲了後路安全，「悉兵來拒」的可能性很大。斜軫的兵力和注意力既被吸引在應州，雲、朔二州的吏民就可乘機脫身。這是楊業的妙算。

當然，楊業的計劃並不是無可置喙。雲州距離最遠，其吏民如要在宋遼兩軍在應州對峙時乘虛奔入宋境，必須要在宋軍自代州出發時先行棄城南進，即所謂「俟大軍離代州日，令雲州之眾先出」。但如果耶律斜軫的情報效率夠高，在楊業到達應州前就已收到雲州吏民棄城南進的線報，亦即假動作還未被知悉時真實的意圖已經表露，他就未必會再受宋軍的佯攻所蒙蔽。「先入爲主」、或情報分析學上所謂「思想拋錨」(anchor of thinking)，是實施戰略欺騙 (strategic deception) 的關鍵。對方誤信假情報在先，真相才易於掩飾。⁴³ 對方若收到真消息在先，假消息在後，那樣欺騙的效果就很難逆料。再說，這項計劃的成功是以時間配合爲先決條件的，任何一路太快或太慢的行動都會影響協調。越複雜，行動的單位越多，越倚重時間性的作戰計劃，越容易因組織故障而失誤，亦即是說「組織風險」(organization risk) 越大。⁴⁴

然而縱使楊業的方案存在一定的漏洞，和負上較大組織風險，還是要比正面出擊爲好，起碼可以避免或減低戰鬥風險 (combat risk)。由於出擊應州只是佯攻，只要將遼軍吸引住，不必定求戰勝都可以完成任務。那樣他的戰術手段便有較大彈性——他可以在應州稍戰即退，或者高壘深溝，拖延時日。相反，監軍王侁所提出的計劃，則具有較大的戰鬥風險。他指楊業「領數萬精兵而畏懦如此」，認爲「但趨雁門北川中，鼓行而往馬邑〔朔州〕」。⁴⁵ 這裏沒有提及雲、應二州吏民如何撤退。但且不論雲、應事勢如何，即使要到達朔州，也還不易。耶律斜軫近在寰州，中途加以邀擊的可能性很大。更可慮的是：強敵在前，不戰勝無以奪路，也就更沒法把朔州吏民接回。換言之，按照王侁的方案，撤退吏民的戰役任務，必須仰賴一個戰術決戰的勝利來完成。楊業認爲獲得這種勝利的機會微乎其微，簡直是「必敗之勢也」。然而都部署潘美卻支持王侁，楊業唯有自言「業當先死於敵」，引兵「自石峽路趨朔州」。臨行時他請潘美在陳家谷口接應，「張步兵強弩，爲左右翼以援，俟業轉戰至此，即以步兵夾擊救之，不然者，無遺類矣」。⁴⁶ 楊業知道自己的戰役方案不被採納，很可能陷入困境，唯有寄望於戰術部署——陳家谷口的步兵、強弩或能扭轉敗局。

⁴³ Richard J. Jr. Heuer, "Cognitive Factors in Deception and Counterdeception," in *Strategic Military Deception*, edited by Donald C. Daniel and Katherine L. Herbig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2), pp. 30-70. 小理查茲·J. 霍耶爾：〈欺騙與反欺騙中的認知因素〉，載唐納德·丹尼爾、凱瑟琳·赫伯格（編），徐曉軍、馮新生（譯）：《戰略欺騙》（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1年），頁28-64。

⁴⁴ Edward N. Luttwak, *Strategy: 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 pp. 10-15. 又中譯本，頁11-14。

⁴⁵ 《長編》，卷二十七，頁621。馬邑指朔州，見《遼史》，卷四十一，〈地理志五〉，頁51。

⁴⁶ 《長編》，卷二十七，頁622。

可是宋軍的戰術運作也比他的想象要糟。首先，他的對手耶律斜軫也作了一套部署。「斜軫聞繼業〔即楊業〕出兵，令蕭撻凜伏兵于路。明旦，繼業兵至，斜軫擁眾為戰勢。繼業麾幟而前，斜軫佯退。伏兵發，斜軫進攻，繼業敗走」。⁴⁷ 這段記載文字不多，卻最全面扼要地把當天交戰的先後階段描劃出來，比宋人記載和《遼史》其他段落都要齊備。⁴⁸ 在會戰初期，耶律斜軫詐敗而退，楊業在表面上佔了上風。可是當伏兵大起之際，斜軫反攻，楊業於是敗走。在這段文字表面看來，楊業的表現和一個無謀之將毫無分別；輕易的落入圈套。可是早在980年，他和潘美以類似手段於雁門西徑擊敗十萬遼師。自雁門之捷，契丹兵馬「望見業旗即引去」，⁴⁹ 按理說楊業對埋伏計不能算外行，卻還是中了埋伏。可是從嚴格角度來看，楊業所擁有的戰術彈性其實很少，而這是其所執行的戰役計劃所決定的。如上所述，宋軍取雁門北川大路和遼軍正面對敵，楊業不能戰勝斜軫就難以奪路而前。加上王侁的冷言冷語，越發使他有進無退。因此楊業中伏而敗，實有無可奈何的一面。

正當楊業和遼軍交鋒的時候，潘美和王侁卻率部離開了陳家谷口。首先是王侁「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為敵敗走。侁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俄聞業敗，即麾兵卻走」。⁵⁰ 黃昏時，楊業退回陳家谷口，望見無人，於是大哭，反身力戰，結果在狼牙村中箭被擒，三日不食而死。⁵¹ 他的部下據說全部戰死，無人生還。⁵²

中國民間，特別是有關楊業一門的戲曲、小說，好將陳家谷戰役描繪成一場殘酷的

⁴⁷ 《遼史·耶律斜軫傳》（卷八十三，頁1302-3）。

⁴⁸ 《長編》但云「業力戰，自日中至暮，果至谷口」，而不載其中伏之事（卷二十七，頁622）。王稱《東都事略》卷三十四〈楊業傳〉（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頁546-48）、《宋史》卷二百七十二〈楊業傳〉（頁9304-5）同。《遼史》卷十一〈聖宗本紀二〉但云：「至是，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至狼牙村，惡其名，不進；左右固請，乃行。遇斜軫，伏四起，中流矢，墮馬被擒。」（頁123）更為費解。同書卷八十三〈耶律奚低傳〉（頁1303）、卷八十五〈蕭撻凜傳〉（頁1313）、同卷〈耶律題子傳〉（頁1315），均散見擊敗楊業之事，但不如斜軫傳詳盡。

⁴⁹ 《長編》，卷二十一，頁482。關於雁門之捷，見同卷，頁473。

⁵⁰ 同上注，卷二十七，頁622。

⁵¹ 同上注。《遼史·聖宗本紀二》也說楊業是「瘡發不食，三日死」（卷十一，頁124）。關於楊業之中箭被擒，卷八十三〈耶律奚低傳〉有詳盡的記載：「凡戰必以身先，矢無虛發。繼業敗于朔州之南，匿深林中。奚低望袍影而射，繼業墮馬。先是，軍令生擒繼業，奚低以故不能為功。」（頁1303）《長編》也說楊業「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為敵所禽」（卷二十七，頁622）。

⁵² 見《長編》所載：「士卒殆盡，……其敗也，麾下尚百餘人，……眾皆感泣，不肯去，遂俱死，無一人生還。」（卷二十七，頁622）《東都事略·楊業傳》（卷三十四，頁548）、《宋史·楊業傳》（卷二百七十二，頁9305）略同。大抵有關楊業傳的來源，似皆以國史原傳為依據。《長編》卷二十七引王侁的話「領數萬精兵而畏懦如此」（頁621），未知是否即為楊業部

人事鬥爭——潘美並非不知此戰必敗，但卻故意逼著楊業敗死。近年一些楊家將的傳記，也傾向這種看法。⁵³無可否認，楊業的敗死有著人事傾軋的因素在內。《長編》引述楊業遺言：「上遇我厚，期捍邊破賊以報，而反為姦臣所嫉，逼令赴死，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於異地！」⁵⁴自是這種看法的由來。

潘美和王侁固然嫉忌楊業，但若將整個陳家谷戰役——從策劃到撤走援兵——都看成有意逼死楊業的一個過程，恐怕不是持平之論。潘美為都部署，楊業知代州，王侁是監軍，這三個人的利害並不完全衝突。楊業戰勝了，潘美和王侁都有機會分享他的戰功，有論者指出在雍熙北伐時楊業的戰功多為潘美冒去。⁵⁵但這種關係並沒有必然構成害死楊業的動機。相反，如果潘美要靠楊業為自己打勝仗，那樣他更不應該逼死楊業。就潘美的個人利益來看，楊業是他手下頭號勇將，他可以不採納其任何主張，甚至冒去他的功勞，但卻看不出有甚麼必要逼他非死不可。

有的論著認為潘美撤走陳家谷援兵是為了逼死楊業，進而認為《長編》的記載屬於事後的文飾之辭，這也未必盡然。⁵⁶《長編》說：

美即與侁領麾下兵陣於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為敵敗走。侁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灰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即麾兵卻走。⁵⁷

換言之，援兵離開谷口是以為敵人敗走，於是前行了二十里，發覺楊業已敗，才麾兵退走。這段話無疑有多少文飾意味，如「美不能制」，便有卸責於王侁一人之嫌。沿灰河「西南行二十里」也屬可圈可點，因宋軍似不應沿西南方向進軍，但這須考出所謂灰河之方位及其走向才能進一步加以論斷。不過，其中王侁「以為敵敗走」，及「俄聞業敗，即麾兵卻走」，卻很符合《遼史》的記載。斜軫曾先行詐敗，這可以給王侁使人

[上接頁91]

下人數。《遼史·耶律斜軫傳》載斜軫收復山西之戰役，首破賀令圖，「斬首數萬級」，繼而用兵略取蔚州，「斬首二萬餘級」，此後再破潘美，賀令圖及生擒楊業兩戰，則不載斬級之數（卷八十三，頁1302-3）。按斜軫傳文意，以及提到「繼業陷山西諸郡，各以兵守，自屯代州」，可知楊業一軍才是主力，兵力應較賀令圖等為多，再除去一些誇飾的成分，楊業兵力達數萬之譜，似不為過。同時考慮到斜軫所用的佯敗伏擊戰術，若楊業兵力太少，也不必如此。

⁵³ 郝樹侯：《楊業傳》（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37-40。

⁵⁴ 《長編》，卷二十七，頁622。

⁵⁵ 郝樹侯：《楊業傳》，頁31-33。

⁵⁶ 沈起煒：《楊家將的歷史和傳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42。此外，常徵的《楊家將史事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亦有類似看法。

⁵⁷ 《長編》，卷二十七，頁622。

登高遠望，以為敵軍敗走下一個很好的注腳。及後「伏兵發，斜軫進攻，繼業敗走」，於是潘美、王侁亦皆退走，而放棄在陳家谷口夾擊的機會了。楊業走到谷口發現空無一人，自產生強烈的被出賣感覺。可是《長編》所載純屬潘、王事後的飾辭，還是大致可信？就陳家谷戰役的記載來看，潘美以為敵軍敗退而離開陳家谷口，卻同《遼史》記載當日曾經詐敗相契合，雖難作最後論斷，但可能反映了某一程度的真實。

總之，陳家谷戰役和歧溝關戰役不同。後者有收復燕雲的遠大戰略目標，從而使宋人必須承擔相應的戰鬥風險；而戰鬥風險能否減低，端賴精心策劃的戰役計劃能否達到預期效果。但陳家谷戰役只是為了非常有限的戰略目標（撤退四州吏民），卻承擔很大的戰鬥風險，其戰役計劃也缺乏彈性，再加上戰術協同失誤和人事傾軋，因此失敗殊屬人為。更重要的是，撤退時機的延誤，出擊計劃的草率和協同夾擊的失誤，都完全表現出宋軍戰略、戰役和戰術上的輕敵浪戰——對局勢認識不清，因而輕率地下進擊命令。可是陳家谷的悲劇，雖然反證了楊業見解的正確，但並沒有帶來普遍的醒覺，出擊的意圖時而復現。

君子館戰役：戰略角度研究

大部分宋人記載，如《東都事略》、《長編》，及元人所修《宋史》，都將君子館戰役描繪為一場守勢作戰。《長編》載「契丹將耶律遜寧〔休哥〕號于越者，以數萬騎入寇瀛州。都部署劉廷讓與戰於君子館」。其他各書記載大致相同。⁵⁸《遼史·聖宗本紀》也詳盡的記載了南侵的準備，並說：「上率大軍與宋將劉廷讓、李敬源戰于莫州，敗之。」⁵⁹《遼史》沒有提及君子館這個地名。君子館在瀛、莫二州間，說「戰于莫州」亦無大問題。可是值得考究是〈耶律休哥傳〉的記載：

及太后南征，休哥為先鋒，敗宋兵於望都。時宋將劉廷讓以數萬騎並海而出，約與李敬源合兵，聲言取燕。休哥聞之，先以兵扼其要地。會太后軍至，接戰，殺敬源，廷讓走瀛州。⁶⁰

這段記載遼軍進犯時，宋軍是否亦在部署進擊？〈耶律休哥傳〉的記載驟看似是孤證，

⁵⁸ 《長編》，卷二十七，頁625。《宋史·劉廷讓傳》（卷二百五十九，頁9003）同；徐松《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一九六冊蕃夷一之一一云：「十二日，瀛州言：都總管劉廷讓率兵與虜遇于君子館，接戰。」（頁7678）《東都事略·契丹傳》云：「復寇三關，瀛州帥劉廷讓戰于君子館，敗績。」（卷一百二十三，頁1896）劉廷讓、劉延讓都是劉廷讓的筆誤。

⁵⁹ 《遼史·聖宗本紀二》（卷十一，頁126）。

⁶⁰ 《遼史·耶律休哥傳》（卷八十三，頁1301）。

但卻有不少蛛絲馬跡與此記載相符。首先，上文已提出李繼隆任滄州都部署的疑點。滄州並不是遼軍入侵的要劇地界，宋遼戰爭期間宋軍一般只在河東、鎮、定、高陽關（關南、時或移至瀛州）設置都部署。在滄州設立都部署是極其罕見的制置。休哥傳上說宋軍「數萬騎並海而出」，容或有誇飾休哥戰功的意味，但滄州卻正在海邊，而李繼隆也正擔任不常設的滄州都部署，這似乎不完全是巧合。

其實遼廷早在年頭宋軍北伐時，已著意防範後者從東路並海進軍。三月中曹彬首次攻陷涿州，遼廷立即「詔林牙勤德以兵守平州之海岸以備宋」。平州和滄州隔海相對。遼廷在下詔給蕭勤德的同時，又特別知會平州節度使迪里姑，「若勤德未至，遣人趣行；馬乏則括民馬；鎧甲闕，則取於顯州之甲坊」。⁶¹ 以此足見遼廷對平州海岸防務之高度重視。平州（今盧龍縣）控制榆關（今山海關）走廊，若遭宋軍切斷，則對遼軍增援燕南造成極大不便。固然，宋軍若有這種企圖，也需承擔不少戰鬥和組織風險。但是即使宋軍沒有顯著企圖，站在遼的立場這一路也不可不防。到四月，宋軍的主攻方向逐漸明朗，平州海岸沒有受到嚴重威脅，反而田重進在山後節節進逼，遼廷才抽調平州駐兵西援蔚州。⁶² 可是在月底，遼聖宗御帳抵達沙沽河，又再召見蕭勤德議事，內容不詳。⁶³ 總之，遼對宋軍沿海岸線發起進攻抱有戒心，而宋軍亦確實在滄州設立了都部署一級的高層指揮單位。

除滄州方面出現不尋常的高層指揮單位外，知雄州賀令圖也在積極的招攬遼南京守將耶律休哥。休哥自稱獲罪，表示願意降宋。賀令圖「不虞其詐，自以為終獲大功，私遺于越（休哥）重錦十兩」。⁶⁴ 作為雍熙北伐的始作俑者，賀令圖顯然並沒有在歧溝關之敗後放棄立不世之功的夢想，反而加緊招撫休哥，這也是宋軍具有積極意圖的一種徵兆。

那麼，宋軍是否正在策動「並海而出」的戰役？當然，宋朝官私史料很少提及此類行動的意圖，但也有和《遼史》記載相符的。例如曾鞏《隆平集》便說：「是年（雍熙三年（986））十二月，復命劉廷讓再舉北伐之兵，而全軍陷於君子館。」⁶⁵ 嚴寒的十二月似乎不是再舉北伐的理想時機。但十二月是下達命令的時間，不等於攻勢要立即展開。雍熙北伐也是在正月時即議動兵，到三月才正式發動攻勢。⁶⁶

但即令《長編》、《宋史》等完全不提及東線宋軍在策動何事，亦不足為奇。宋初二帝的戰役計劃大都沒有事前公佈和討論。曾經拿出來和部分臣僚諮議的屬「先南後

⁶¹ 《遼史·聖宗本紀二》（卷十一，頁120）。

⁶² 同上注，頁121。

⁶³ 同上注，頁121-22。

⁶⁴ 《長編》，卷二十七，頁625。

⁶⁵ 曾鞏：《隆平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卷十七，頁645。

⁶⁶ 《長編》，卷二十七，頁602-8。

北」一類大戰略構想，而非作戰計劃本身。太祖定荆湖、後蜀、都向諸將面授方略；太宗首謀北伐，與諸將會商，而史臣僅載崔翰「時不可失」一言。班師後，太宗對滿城會戰的指導方針，《長編》所載亦僅寥寥數語。雍熙北伐，太宗一日六召樞密而宰相不預，更為史家熟知。⁶⁷ 事後他在優詔答趙普時披露作戰計劃，也只可作為一種特例來看。⁶⁸ 至於常為史家徵引的宋琪奏疏，其具體的作戰方案和太宗所實行的有很大出入，其影響力之有限可想而知了。何況這份奏章也不一定是雍熙三年所寫的。⁶⁹ 若以上的戰役計劃不幸胎死腹中，史書中留下的線索亦會同樣有限。後來文臣參與軍事漸漸普及，對作戰計劃的討論才日益公開。總之宋雍熙以前，作戰計劃的討論和制定透明度較低，史書所載亦極其簡略，這和端拱（988-989）以後文臣紛紛上書討論邊事成一鮮明對照。因此，探討宋初軍事行動的意圖時，軍事活動本身仍是最主要的依據。

綜合《遼史·耶律休哥傳》及《隆平集》對於宋軍進行北伐的記載，《長編》、《宋史》所載滄州出現都部署一級的高層指揮單位，以及知雄州賀令圖積極策反耶律休哥的試圖，都顯示宋人正在策劃新的攻勢。

當然，這次攻勢未成事實便在遼軍先期發動的攻擊下遭到失敗。遼軍的攻勢準備了兩個月。女真也請求出兵從征，獲准。在十一月，遼廷正式命將出師，以耶律休哥為先鋒都統，北院大王蒲奴寧守山後，林牙謀魯姑、駙馬都尉蕭繼遠沿邊巡轄。隨行的將領有北皮室詳穩蕭排押（排亞）、彰德軍節度使蕭撻凍等。⁷⁰

遼軍選擇兩個突破口，一面以蕭排押、蒲魯古領偏師壓制滿城，而主力則直趨唐興口。唐興口位於定州、高陽關之間，⁷¹ 選擇此處或者出於突擊宋軍定、瀛兩線接合部的考慮，或與這一帶的河道走向、橋津方位有關，仍待進一步考定。抵達唐興縣時，遼軍進擊滹沱橋，「時宋軍屯滹沱橋北，選將亂射之，橋不能守，進焚其橋」。⁷² 次日

⁶⁷ 《長編》，卷二十七，頁618。

⁶⁸ 當時反對北伐，或主張持審慎態度的文臣不止一二人，而太宗特下手詔答書，並披露其作戰計劃，可謂特為優渥，大概是考慮到趙普的政治聲望。趙普又即上謝表，事見《長編》卷二十七，頁614-17。

⁶⁹ 按《長編》李燾注：「本傳及《會要》、《經武聖略》皆云端拱二年〔989〕，時討幽薊，召羣臣各言邊事，琪上此疏。按端拱二年，契丹侵擾河北，朝廷吁食，豈暇遠議幽薊。此疏蓋雍熙三年春曹彬等出師時所上，故專言幽薊事宜，今掇出附見于此。」（卷二十七，頁608注）可是除此之外，李燾亦沒有更多證據來支持此項繫年調動。

⁷⁰ 《遼史·聖宗本紀二》（卷十一，頁125-26）。

⁷¹ 《遼史·聖宗本紀二》云：「壬辰，至唐興縣。……癸巳，涉沙河，休哥來議事。」（卷十一，頁126）唐興縣是五代地名，至宋已廢，然確在滹沱河北。見譚其驤等：《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海：地圖出版社，1982年），隋唐五代十國時期分冊，頁48-49。

⁷² 《遼史》，卷十一，頁126。

涉沙河、休哥來御帳議事。可是遼軍在滿城方面進展有限，楮特部節度使盧補古、都監耶律盼被宋兵擊敗。⁷³ 後來蕭排押終於攻陷滿城，那大概是十二月才發生的事。⁷⁴

遼軍主力從唐興口突破成功，立即派遣強有力的先頭部隊向縱深推進，遏制宋軍的反擊行動。蕭撻凜和耶律迪子轉攻東路；耶律休哥則向西南深入，在望都擊敗宋軍先頭部隊，深入祁州附近；⁷⁵ 蕭排押則加強對滿城方向的攻擊，兩名敗將盧補古、耶律盼則遭替換。十二月初，遼軍主力東轉，九日(甲辰)，「詔南大王與休哥合勢進討」。⁷⁶ 遼軍隨即便在瀛、莫二州間的君子館碰上劉廷讓的主力。⁷⁷ 這一天是十二月十二日，漫天大雪。⁷⁸

⁷³ 《遼史》云：「癸巳，……北皮室詳穩排亞獻所獲宋謀二人，上賜衣物，令還招諭泰州。楮特部節度使盧補古、都監耶律盼與宋戰于泰州，不利。甲午，……以盧補古臨陣遁逃，奪告身一通，其判官、都監各杖之。」(卷十一，頁126)內文所謂泰州，實即滿城。薛居正等《舊五代史郡縣志》(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云：「後唐天成三年三月，升奉化軍為泰州，以清苑縣為理所，至晉開運二年九月，移就滿城縣，至周廣順二年二月，廢州，其滿城割屬易州。」(卷一百五十，頁2017)可見遼人以五代地名，呼滿城為泰州。攻略滿城之主將為蕭排押，見《遼史·蕭排押傳》：「統和初，為左皮室詳穩，……是冬，攻宋，隸先鋒，圍滿城。」(卷八十八，頁1341)這個蕭排押應即《聖宗本紀》那個「北皮室詳穩排亞」，其部下有盧補古、耶律盼。

⁷⁴ 《遼史·蕭排押傳》云：「圍滿城，率所部先登，拔之，改南京統軍使。」(卷八十八，頁1340)然則滿城最後亦告失守。但據同上注《聖宗本紀》說癸巳日盧補古等戰敗，乙未日遼廷派「御蓋郎君化哥權楮特部節度使，橫帳郎君佛留為都監，代盧補古」，則乙未日以後滿城的戰事仍未解決，而須命將代替盧補古。據《宋史·太宗紀》(臺北：中華學術院，1972年)，雍熙三年十二月以乙未朔(卷五，頁30)。宋、遼曆相差一天，則乙未是遼的十一月最後一天，滿城仍在宋人之手。因此遼將蕭排押的攻陷滿城，最快要到十二月才可能。

⁷⁵ 《遼史·聖宗本紀二》云：「乙未，……命彰德軍節度使蕭闞覽、將軍迪子略地東路。……十二月己亥，休哥敗宋軍於望都，遣人獻俘。壬寅，營于滹沱北，詔休哥以騎兵絕宋兵，毋令入邢州。」(卷十一，頁126)校勘記謂邢州當作祁州(頁128)。

⁷⁶ 《遼史》卷十一《聖宗紀二》，頁126。

⁷⁷ 《中國歷史地圖集》，宋遼金時期分冊，頁16-17，河北東路。又見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臺北：新興書局，1967年)，卷十三，頁四《君子館》附注。有關地點考證，程光裕《宋太宗對遼戰爭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言之頗詳(頁153)。

⁷⁸ 《宋會要輯稿》第一九六冊蕃夷一之一一云：「十二日，瀛州言：都總管劉廷謙〔「謙」應為「讓」之誤〕率兵與虜過于君子館，接戰，會天大寒。」(頁7678)《長編》卷二十七所載略同(頁625)。《宋史·太宗紀二》(中華學術院版)，雍熙三年「十二月乙未朔，大雨雪」(卷五，頁30)。

君子館戰役：戰役及戰術研究

當時宋軍在關南高度集結，其戰鬥序列計為：

- 瀛州都部署劉廷讓；
- 滄州都部署李繼隆；
- 高陽關部署楊重進；
- 知雄州賀令圖；
- 御前忠佐神勇指揮使桑贊。

還有《遼史》所載的大將李敬源，可能是李繼隆之誤。⁷⁹ 另外，「大將之出，必辟為先鋒」的張思鈞當時也在劉廷讓麾下。⁸⁰ 據遼方記載，宋軍單是騎兵已達數萬，加上步兵、強弩等兵種之後，為數應很可觀。

劉廷讓的戰術部署，是「先以麾下精卒與滄州都部署李繼隆令後殿，緩急期相救」。⁸¹ 劉廷讓自己來打頭陣，可說得上有大將的氣概。可是作戰剛開始，急劇轉壞的天氣卻起了很大影響。《長編》記載：「會天大寒，我師不能彀弓弩，敵圍廷讓數重。……繼隆退屯樂壽。」⁸² 李繼隆退往瀛州以南的樂壽（今獻縣，距河間約三十公

⁷⁹ 《長編》（卷二十七，頁625）具見劉廷讓、李繼隆、賀令圖、楊重進及桑贊之官職，但不見有李敬源其人。《遼史》三見李敬源之名，卷十一〈聖宗本紀二〉云：「上率大軍與宋將劉廷讓、李敬源戰于莫州，敗之。」（頁126）卷八十三〈耶律休哥傳〉云：「時宋將劉廷讓以數萬騎並海而出，約與李敬源合兵，聲言取燕。休哥聞之，先以兵扼其要地。會太后軍至，接戰，殺敬源，廷讓走瀛州。」（頁1301）卷八十四〈耶律沙傳〉云：「復從伐宋，敗劉廷讓、李敬源之軍。」（頁1308）《遼史》屢以劉廷讓、李敬源並稱，似乎是宋軍之重要將領。休哥傳上說廷讓「約與李敬源合兵」，事實上和廷讓合兵的是李繼隆。因此，李敬源應是李繼隆之誤。可是，李繼隆根本沒有到戰場，後來怎能讓休哥「接戰，殺敬源」呢？且宋人對陣亡將士的優恤一向特重其事，連楊業手下的親將王貴之死，也有記載（見《長編》，卷二十七，頁622-23）。如此重要的一個將領李敬源的任命和戰死卻完全不見於史籍，豈不奇怪。也許休哥殺了某一冒認李繼隆的將校而信以為真。程光裕《宋太宗對遼戰爭考》說李敬源是益津關守將（頁152），未知何據。

⁸⁰ 《宋史·張思鈞傳》（卷二百八十，頁9508）。又云：「雍熙三年，邊人寇河間，劉廷讓會戰君子館，命思鈞翼從。時天大寒，弓不得彀，援兵不至，於是敗績，陷留軍中數年，役役不得還。端拱初，自契丹始逃歸。」

⁸¹ 《長編》，卷二十七，頁625。

⁸² 同上注。《宋史·劉廷讓傳》（卷二百五十九，頁9003）同。

里)，劉廷讓孤軍奮戰，「而敵援兵復至，〔桑〕贊引眾先遁，廷讓全軍皆沒，死者數萬人，廷讓得麾下他馬乘之，僅脫死。先鋒將六宅使、平州團練使、知雄州賀令圖，武州團練使、高陽關部署楊重進，俱陷于敵」。⁸³ 「而敵援兵復至」一語和《遼史》中耶律休哥先扼要地，然後「太后軍至」的記載相合。這反映出遼人捕捉戰機，及向決戰點迅速集結兵力的成功。劉廷讓騎別人的馬突圍，又有記載說他「三易馬而免」，⁸⁴ 但賀令圖、楊重進都不能脫身，可見突圍之難了。張思鈞被俘，日後逃回。⁸⁵ 宋軍死者數萬人，按照宋史臣的說法，此役的損失足以和歧溝關之役相比。⁸⁶ 遼軍的損失沒有記載。還在早期突破階段的時候，遼將盧補古在滿城遭到挫敗，以致臨陣易將，損失似乎不輕。到君子館會戰，遼方有「國舅詳穩撻烈哥、宮使蕭打里死之」，可見戰鬥激烈。⁸⁷

殲滅了劉廷讓的大軍之後，遼人還打算殲滅田重進部，但後者很巧妙地避開了。於是遼軍縱兵大掠。「癸丑，拔馮母鎮，大縱俘掠。丙辰，邢州〔似為祁州之誤〕降。丁

⁸³ 《長編》，卷二十七，頁625。同卷又詳載賀令圖之被擒：「令圖性貪功生事，復輕而無謀。于越〔休哥〕素知令圖，嘗使謀給之曰：『我獲罪於契丹，且夕願歸朝，無路自投，幸君少留意焉。』令圖不虞其詐，自以為終獲大功，私遺于越重錦十兩。至是，于越傳言軍中，願得見雄州賀使君。令圖先為所給，意其來降，即引麾下數十騎逆之，將至其帳數步外，于越據胡床罵曰：『汝嘗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耶！』麾下左右盡殺其從騎，反縛令圖而去。……初，令圖與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天下笑之。」（頁625-26）令圖既被擒，從騎亦皆死，宋史官怎樣得知兩人對答內容，不無可疑。《遼史·聖宗本紀二》云：「乙巳，擒宋將賀令圖、楊重進等。」（卷十一，頁126）而休哥傳不載此事。大概賀令圖之被擒應為事實，但當時宋軍形勢已極其不妙，還會不會「意其來降」？至於休哥罵他「汝嘗好經度邊事」的話，則很可能是後來「天下笑之」的時候加以醜化誇張之辭。

⁸⁴ 《隆平集》，卷十七，頁645。

⁸⁵ 《宋史·張思鈞傳》（卷二百八十，頁9508）。

⁸⁶ 《長編》云：「曹彬及劉廷讓等相繼敗覆，軍亡死者，前後數萬人。」（卷二十八，頁631）曹彬提十萬之師北伐，見《長編》卷二十七（頁617）；同書又見太宗言「卿以十餘萬眾聲言取幽州」（頁612），則兵敗而失數萬人是不足奇的；《遼史·聖宗紀二》云：「五月庚午，遼師與曹彬、米信戰于歧溝關，大敗之，追至拒馬河，溺死者不可勝紀；餘眾奔高陽，又為遼師衝擊，死者數萬。」（卷十一，頁122）卷八十三〈耶律休哥傳〉所載略同（頁1300），足證《長編》所言。劉廷讓軍的實力，同上休哥傳說有「數萬騎」（頁1301）。《宋史·劉廷讓傳》說「廷讓一軍皆沒，死者數萬人，僅以數騎獲免」（卷二百五十九，頁9003）。二史記載頗為符合。

⁸⁷ 《遼史·聖宗紀二》（卷十一，頁126）。

已，拔深州，以不即降，誅守將以下，縱兵大掠」。⁸⁸ 以上《遼史》的記載反映出遼軍的暴行。至正月，遼軍開始撤退，但仍繼續殺戮，「破束城縣，縱兵大掠。丁卯，次文安，遣人諭降，不聽，遂擊破之。盡殺其丁壯，俘其老幼。戊寅，上還南京」。從退兵時還擊破束城、文安二縣看來，遼軍所循的路線是在瀛州東北向霸州方向出境的。⁸⁹

宋軍失敗的原因何在呢？一般性的原因，如遼軍選擇宋軍新敗之際入侵、擁有較優勢的騎兵、機動力高、「寒而彌堅」、較適合寒冷季節作戰、能在主要方向上迅速集結等等特點；而宋軍則反之，加上賀令圖有輕敵之嫌，桑贊臨戰先走，皆足以構成失敗。但除了這些較明顯的原因之外，從現有資料看，宋軍的戰役決策和採用的戰術，還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應否接受會戰，或決戰時機是否適當；二是劉廷讓分精兵給李繼隆作前後兩梯次部署，是否一個對抗遼軍優勢騎兵的有效措施。

以下先分析第一點。應否接受決戰，當時即劉廷讓和李繼隆已有不同判斷，現在更應從廣闊的角度去看。當然以下的研判主要是戰役層次上的，而不是戰略層次上的，因為遼軍是實際上採取進攻的一方，握有戰略主動，宋軍在選擇戰略決戰的時機上並沒有很大的自主權。十二月初遼軍主力東進，和蕭撻凜、耶律休哥部會合，已具有會戰態勢。宋軍當時可能採取的戰役部署大致如下：（一）按照機動防禦方針，謀求定、瀛、滄三個都部署司協同作戰，以劉廷讓、李繼隆當之於前，田重進擊之於後；這種戰役法宋軍在滿城會戰時曾成功運用；但在雍熙三年十二月初田重進軍的活動紀錄卻遠在望都至歧溝關一線，看不見有東進關南的企圖。（二）按照據點防禦的方針，劉廷讓應避免決戰而力保瀛州，甚或將李繼隆部移到莫州或深、祁二州一帶。但從前面所列的宋軍戰鬥序列看來，劉廷讓似是要集結兵力拒戰或進擊，而不像要進行各別的據點防禦。（三）正面抗擊，集中瀛、滄兩部署司之力決一死戰。這正是劉廷讓所實行的。

宋軍沒有實行機動防禦的原因不難明瞭，因為戰區裡沒有任何人具備相應的權力來指揮三路軍馬的調動。在那種情況下，亦即是說，只要劉廷讓不能指揮田重進，他就無法組織三路協同的機動防禦作戰。後來宋軍設立鎮、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才出現了這一級的指揮機制。當然，宋太宗所代表的最高決策能下此類命令，但無論文獻記載，

⁸⁸ 同上注，頁127。所謂邢州應即祁州之誤，見頁128校正。深州之失陷，亦見《長編》：「二月丁未，詔以故靜安軍為深州治所，避敵禍也。深治陸澤，於是省陸澤入下博，因改下博曰靜安。」（卷二十八，頁631）深州移治避敵，可見原來的治所較易受到攻擊。太宗亦曾下詔，專門吩咐官吏必須安撫百姓，且明言「已選差知州、通判，職官往彼」，與《遼史》記載「以不即降，誅守將以下」相符。正因知州將吏都被殺，所以才要更改州治，重新任命一批人選。太宗詔見《宋會要輯稿》第一八五冊兵二七之一，頁7247。宋敏求編《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一百八十五有另一道「敵人入寇後推恩詔」（頁675），詳述其善後措施。

⁸⁹ 《遼史·聖宗紀三》（卷十二，頁129）。文安後來成為霸州治所，見王存：《元豐九域志》（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二，頁70。束城是瀛州（河間府）屬縣，見同書頁68。

或從實際的軍事行動中都沒有任何線索說明宋軍有從事此類機動防禦的意圖。總之，當時的宋軍看不出有機動防禦的意圖，也缺乏指揮這項行動的長官。

田重進對遼軍攻勢的反應很耐人尋味。在上述情況下他有三個選擇：（一）主動向高陽關方向進兵，試圖與劉廷讓協同，尋求與遼軍主力決戰的機會；這是一個積極的意圖，但很易，也確實為對方所預期；（二）向滿城——易州方向進兵，對遼軍側翼施壓；這是一個積極而冒險性較低的選擇，但側翼牽制的效果端賴對方的戰役目的而定，而且也很易失去和東線劉廷讓配合行動的密切性；（三）堅守定州不出；這是後來傅潛、王超所奉行堅壁清野戰略的重要一環，戰鬥風險減至最低，但完全放棄野外的控制權。田重進當時對遼軍入侵所作出系列反應行動，似乎是選擇第二個方案。十二月五日，田重進奏稱「率師入遼境，攻下歧溝關，殺守城兵千餘及獲牛馬輜重以還」。⁹⁰ 史書沒有明確記載他的兵力和將佐，其監軍袁繼忠的傳記也沒有記載這次行動，不過田重進部下的將官孫全照，卻可能在這場戰鬥中立了功。⁹¹ 宋軍攻拔歧溝關一事《遼史》不載，不過若考慮到遼軍的進攻日程，就可以承認這事確有可能。十一月的最後幾天，滿城還在宋軍手中。二十八日（癸巳）遼將盧補古在滿城失利，三十日（乙未）遭撤換。田錫《咸平集》記載田重進破歧溝關的確實日期是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十二月五日田重進又再殲滅遼軍五千之眾。⁹² 可見十一、二月之間田重進在遼軍側翼頗佔上風。可是在他捷報抵達開封的同日，耶律休哥在定州以北的望都也擊敗了一支宋軍的先頭部隊，田重進在年底唯有退回鎮州。那樣，定州部署司雖然發動了反擊，甚至令遼軍在滿城方向的進攻遇到挫折，但未能在對方側翼構成重大威脅。遼軍的注意力始終仍在東方。

從以上看來，在君子館戰役的前夕，宋軍雖完成了「分屯諸軍」的態勢，但幾許跡象都說明它沒有真正將戰略重點擺到防禦上面。部分文獻證據顯示宋軍正在籌劃新攻勢，而它對遼軍先期入侵的反應也是較側重於孤立的反擊和逆襲，沒有發揮防禦戰的優點。

⁹⁰ 《宋史·田重進傳》（卷二百六十，頁9024）。同書《太宗紀二》（中華學術院版），雍熙三年十二月：「己亥，定州田重進入契丹界，攻下歧溝關。」（卷五，頁30）《宋會要輯稿》第一九六冊蕃夷一之一：「十二月五日，定州田重進奏：入虜界攻下歧溝關，殺守城兵千餘人，及獲牛羊積聚，器甲甚眾。」（頁7678）

⁹¹ 《宋史·袁繼忠傳》（卷二百五十九，頁9004-6）。又《宋史》卷二百五十三《孫行友傳》附《孫全照傳》云：「雍熙中授京南巡檢，俄隸幽州部署曹彬麾下，遷供奉官、閤門祇候，歷靜戎、威虜二軍監軍。從田重進擊賊有功，就加西京作坊使。」（頁8873）孫全照在北伐時隸屬曹彬，那他後來隸屬田重進有功，必在北伐之後。北伐後田重進的戰功可考者只有攻拔歧溝關一事，因此孫全照的戰功可能也是這一次行動而得到的。

⁹² 田錫《咸平集》，《四庫全書珍本四集》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卷二十四，頁二至三。

那麼李繼隆的退走，又應負多少責任呢？首先從權限來說，李繼隆的退卻不宜與桑贊混為一談。桑贊是劉廷讓麾下的將官，而且既已合兵會戰，而「引眾先遁」，有違令脫逃之嫌。李繼隆是滄州都部署，單論指揮權限並不低於劉廷讓，而再往上已經沒有更高級的指揮官了。同時他另主一軍，遇到突發事件時要作獨立判斷是勢所必然的。⁹³縱使退卻的判斷有問題，也只屬於協調方面的錯誤，而非違令先遁。其次從判斷的本身來說，劉廷讓敗陣後回京請罪，「上知為繼隆所誤，不責，逮繼隆」，但後來又無罪釋放，大概是接受了後者的解釋。⁹⁴據李繼隆後來為了鼓勵士氣時所透露，「往年河間不即死者，固將有以報國家耳」。⁹⁵言下之意，死於河間亦無濟於事。《長編》及《宋會要》都記載二將分兵，繼而那致敗的寒流襲來。⁹⁶當氣溫低到弓弩等主要兵器都不能使用，放棄會戰以保存部隊也不失為權宜之策。李繼隆的戰爭生涯中充滿了機權應變的例子，但卻未必是貪生怕死之徒。⁹⁷

第二個問題比較複雜，牽涉到戰術對抗的問題。在宋遼戰爭中，遼軍的騎兵已是公認的佔有優勢。從戰術原理來說，騎兵的戰鬥力有三個主要組成部分：首先，它成群向前的衝擊能給予步兵方陣巨大的壓力，尤其配備重甲的時候。當這種打擊施加在步兵方陣的側面或背面時效力甚至更大。其次，它是弓箭的流動發射臺。在射程武器之間的戰

⁹³ 史書沒有記載當時李繼隆的具體方位。然而從他退向樂壽一點，可推知他的方位似乎在瀛州以南。現今獻縣與相信為君子館的故地從地圖上看距離約在四十到五十公里，中間隔著河間。若當時李繼隆位於瀛州以北，則他應避入瀛州比較安全。有較近的大城不入，而退往較遠的縣城，便難以理解。較有可能的是他位於瀛州以南，因此才退向更南的樂壽。當然還有其他如道路、補給等未知因素影響進一步的論斷。

⁹⁴ 《長編》，卷二十七，頁626。《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處耘傳〉附〈李繼隆傳〉同（頁8964）。

⁹⁵ 《長編》，卷二十九，頁658。

⁹⁶ 《長編》云：「會天大寒，我師不能彀弓弩，敵圍廷讓數重。廷讓先以麾下精卒與滄州都部署李繼隆令後殿，緩急期相救。及廷讓被圍，繼隆退屯樂壽。」（卷二十七，頁625）

⁹⁷ 有關李氏的傳記，除《宋史》外，尚有《隆平集》卷九及《東都事略》卷二十本傳，所載均大同小異。杜大珪（著），洪業等（編）：《名臣碑傳琬琰集刪存附引得》（北平：哈佛燕京學社，1938年；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重印）刪去下篇卷五所載本傳，是因其自《隆平集》中錄出，而《隆平集》尚存於世之故。此外，又有楊億《武夷新集》卷十所載〈李公墓誌銘〉，似為各傳所本，而較為詳盡。綜觀各傳，雖然語多溢美，且以繼隆與帝室關係之密切，常褒揚其戰功；但亦可發現李繼隆確有機變之才。大抵而言，君子館之避敵，與其盡以貪生怕死來解釋，毋寧說這樣一個知機權變的武將，是不會在惡劣的條件下冒險的。楊億所撰墓誌，認為繼隆實有參戰，「劉廷讓求救于公，不候命而往，次君子館，敵伏兵發，廷讓等先不之覺，公力戰敗之，殲戮無數，會暮，敵援兵至，裨將桑贊等先遁，我師遂潰，公獨領百騎達於河間，讒人構之，謂失備。詔徵赴闕，送相府簿責之，公條對明白，即命復位」（《武夷新集》，《四庫全書珍本八集》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卷十，頁二十一），似有為繼隆開脫的嫌疑，現並錄以存疑。

鬥中，其流動性可以減少部隊被擊中的概率，及爭取較佳的射擊角度。最後，它優越的機動力能夠快速集結兵力及移動攻擊重點，甚至繞入步兵方陣的後方，加以切斷和包圍。頭兩項純屬技術和戰術的層次，後一項則從戰術的層次開始提昇到戰役的層次。在敵軍充分運用了騎兵的戰鬥力時，戰鬥便不局限在步兵方陣的正前方，而往往是全方位的。步兵方陣爲了不致陷入四面受敵的不利地步，有必要增加如強弩等射程武器，以減輕正面壓力；並在兩翼及側後方配置騎兵，形成所謂「拐子馬」陣；最後，加大戰術縱深，將部隊單位沿縱深作梯次編配，前後呼應，亦可減少被騎兵從後切斷的危險。當步兵方陣作出上述調整時——加入了騎兵和射程武器等其他兵種，隊形也拉長了時——它實際上已經既非純屬「步兵」，也不能全用「方陣」來形容了。它已變成一個「多兵種合成縱深部署單位」。騎兵對於這種「多兵種合成縱深部署單位」，又需要調整其攻擊方法。因此，戰爭史上常常呈現漫長而錯綜複雜的戰術對抗歷程，而戰術對抗亦成爲研究戰爭史的一條重要線索。以上純從戰術分析，可以明瞭宋軍在對遼戰爭時運用陣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姑勿論宋太宗以陣圖遙制諸將的做法是否正確和是否可行，至少，能否正確地運用戰術隊形——或所謂「陣」，是戰場勝敗的一個主要關鍵。固然我們承認遼軍在騎兵方面具有優勢，可是同時也需要研判宋軍對抗手段的有效性。

當然，整個宋遼戰爭的戰術對抗歷程如此廣闊的論題，並非本文所能容納，但以下至少可以再進一步討論縱深部署的適切性。首先，這種戰術部署較能針對遼軍「退敗無恥，散而復聚」的特點。⁹⁸ 因爲以步兵爲主而機動力較低的野戰部隊，很難在廣闊的作戰空間中主動捕捉敵軍騎兵來加以殲滅，而純粹等待敵人進攻才起而迎戰又會過於消極，因此以一支前衛部隊來吸引對方主力，而後續部隊則乘混戰的機會掩上來作決勝的一擊，不失爲可取之策。當然，將部分兵力部署到縱深上，會帶來正面兵力的相應削弱。但另一方面，體積較小的方陣也具有機動靈活的優點，可以減少相當的戰鬥風險。如果再配合了如強弩等射程兵器，則正面所受的壓力可望再減低一點。尤其要注意到，騎兵的衝刺力及騎射的威力皆需要一定空間，一旦陷入混戰，以上兩個戰鬥力的要素便大打折扣。這時，如後續梯隊能及時反擊，仍可收到後發制人之利。

從宋遼戰爭的歷史個例中，可以發現劉廷讓分精兵給李繼隆作後應，並不是罕見的事例。宋軍野戰部隊往縱深拉開部署具有相當普遍性。滿城會戰(979)時，遼軍在兩翼佔有極大優勢，「東西互野，不見其尾」。宋軍初時按照太宗指示，擺作較疏散的八陣，「陣相去百步」；但後來針對實際情況，改作較爲集中而前後緊密協同的兩陣，「士眾皆喜。三戰，大破之」。⁹⁹ 飛狐之捷(986)時荆嗣以少量前衛部隊與敵纏鬥，「一

⁹⁸ 《長編》(卷二十七，頁606)，宋琪言。

⁹⁹ 《長編》云：「先是，上以陣圖授諸將，俾分爲八陣。……陣相去百步，士眾疑懼，略無鬥志。〔趙〕延進謂〔崔〕翰等曰：『……今敵騎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懸絕，彼若乘我，將何以濟？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於是分爲二陣，前後相副，士眾皆喜。三戰，大破之。」(卷二十，頁462-63)

日五七合，敵不勝，將遁去，〔田〕重進遂以大軍乘之，敵北騎奔潰，生擒大鵬翼」。¹⁰⁰ 陳家谷戰役中楊業的部署也是自己來當頭陣，希望轉戰至陳家谷口時，潘美、王侁的步兵、強弩能及時夾擊，扭轉敗局。當然，限於史料缺乏，現在已不能確知劉廷讓是否也有類似想法。但無論如何，他所採用的是當時相當普遍，而又行之有效的戰術部署。

可是，縱深戰術部署也有內在的問題。它要承擔較大的組織風險。由於軍隊被劃分為超過一個以上行動單位，其空間距離、進退遲速、接應及發動反擊的時間性，都要求較高的相互調協。然而對調協的要求越高，即表示該行動越不能承受微小的錯誤。現代因組織失誤而流產的戰役行動已經不少，在古代落後的通訊條件下，組織風險甚至還要更高。特別是不同位置、單位的指揮官對突發情況的不同判斷，最能影響調協的效果。陳家谷戰役中潘美先而輕進，繼而退避，以致楊業敗死；後來的望都之戰（1003），王超沒有全力赴援，結果讓王繼忠偏師陷敵。¹⁰¹ 調協失誤若再加上人事傾軋，後果之嚴重就更加不言而喻了。

總結以上的戰術分析，可以說劉廷讓的縱深梯次部署是沿襲了宋軍行之有效的熟套，以術語說，是以較高的組織風險換取較低的戰鬥風險。然而在沒有定州方面配合機動防禦的前提下，應否接受決戰仍然很成問題；突然惡化的天氣不但影響了戰鬥力的發揮，也動搖了協同作戰。當然，天氣轉壞為關南宋軍的覆敗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偶然因素，但三個都部署級大單位沒有協同機動防禦，又貿然正面抗擊，也種下了失敗的種子。再考慮到宋軍正在圖謀再舉北伐的記載，及賀令圖對耶律休哥倒戈的深信不疑，則宋軍的失敗，還是有輕敵浪戰之嫌。

瘡痍之卒

君子館戰役之後就不同了。緊接著劉廷讓的覆敗，遼軍在河東方面也發起一個局部攻勢，而宋軍的反應完全迥異。接替楊業知代州的張齊賢因兵力寡不敵眾，原擬約定潘美自太原來會戰；但太宗一接獲君子館的敗報，就立即急令潘美「毋得出戰」。張齊賢得到這個密報，立即把信使暫行囚禁，以防消息外泄。然後他選派二千名廂軍出戰，又派人在山頭虛燃烽火。遼軍以為潘美軍至，立即退卻，撤退中又中了張齊賢的伏擊。「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首二千餘級，俘五百人，獲馬千餘匹，車帳、牛

¹⁰⁰ 《長編》，卷二十七，頁609。

¹⁰¹ 《長編》云：「〔王〕超先發步兵千五百人逆戰於望都縣。翌日，至縣南六里，與敵遇，殺獲甚眾。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雲州觀察使王繼忠常以契遇深厚，思戮力自效。與敵戰康村，……至白城，陷於敵，超等即引兵還定州。」（卷五十四，頁1190）《宋史·王繼忠傳》云：「超、〔桑〕贊皆畏縮退師，竟不赴援。」（卷二百七十九，頁9471-72）

羊、器甲甚眾」，算是小勝。¹⁰² 可能遼軍對代州的攻勢只是牽制性質，沒有主力決戰的意圖，因此被張齊賢的虛張聲勢所攝，稍遭挫敗即中止。

土嶠寨之捷雖是小勝，卻體現了宋軍指揮部門的一個重要的心理變化。初時張齊賢「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還是一派遇敵即戰的作風。但當他的通信人員落入敵軍手中，他馬上警覺到潘美的大軍有危險，而宋太宗也收到君子館的敗報而謹慎起來。「俄而美有候至，云師出并，師行四十里至柏井，忽奉密詔，東路王師衄於君子館，令并之全軍毋得出戰，已還州矣」。¹⁰³ 可見君子館之敗，令宋軍的指揮系統警覺起來，產生了慎重和避免決戰的想法。這種警覺性在夏季並不如何普遍——當時太宗還揚言要殲滅遼的「族類」，王侁則要「鼓行而往馬邑」，劉廷讓「並海而出，聲言取燕」，田重進還奏捷攻拔歧溝關，賀令圖則自以為「終獲大功」。以上這一切銳進、甚至輕敵的姿態，再也沒有那樣集中地表露出來了。

又《東都事略》記載張齊賢調動兵力的方法，也是以防禦作戰為設想的：「齊賢豫簡廂軍千人，為二部分，分屯繁峙，崞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峙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為繁峙兵所敗。」¹⁰⁴

對君子館的戰敗，田重進也馬上提高了警覺。當時遼軍乘勝西指，奪中渡橋、塞土門，切斷了鎮州至河東的交通線。田重進軍大概正從歧溝關回來，若一時找不到承托點，便很容易在唐河一帶遭遇圍殲。這時他採納轉運使索湘的計謀，揚言東進與高陽關合兵，實則迅速南下，重奪中渡橋，進駐鎮州，以穩定唐河附近的局勢。¹⁰⁵ 簡言之，由於成功的使用欺騙，加之以一個迅速果斷的戰役機動，使田重進軍巧妙的擺脫了敵人，回復到有利的防禦態勢。

中央政府也深受戰敗所震動。宋太宗在歧溝關戰後還能維持表面鎮定，到這時卻只

¹⁰² 《長編》云：「神衛都指揮使馬正以所部列州南門外，眾寡不敵。……〔張齊賢〕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敵遙見火光中有旅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嶠寨，掩擊，大敗之。」（卷二十七，頁626-27）《東都事略·張齊賢傳》（卷三十二，頁530）及《宋史·張齊賢傳》（卷二百六十五，頁9154）亦載，但卻說是端拱元年的事。

¹⁰³ 同上注。

¹⁰⁴ 《東都事略·張齊賢傳》（卷三十二，頁530）及《宋史·張齊賢傳》（卷二百六十五，頁9154）亦載，但卻誤載是端拱元年的事。

¹⁰⁵ 《宋史·索湘傳》云：「契丹入寇，王師衄於君子館，敵兵乘勝據中渡橋，塞土門，將趨鎮州。諸將計議未定，湘為田重進畫謀，結大陣東行，聲言會高陽關兵，敵以為然，即擁眾邀我于平虜城。夜二鼓，率兵而南，徑入鎮陽，據唐河，乘其無備破砦柵。及敵兵覺，悉遁走。」（卷二百七十七，頁9420）

能下哀痛之詔了。¹⁰⁶ 在史官筆下的前線情況，慘淡異常。《長編》雍熙四年開頭便說：

春正月，初，曹彬及劉廷讓等相繼敗覆，軍亡死者，前後數萬人。緣邊瘡痍之卒，不滿萬計，皆無復鬥志。河朔震恐，悉料鄉民爲兵以守城，皆白徒，未嘗習戰陣，但堅壁自固，不敢禦敵。敵勢益振，長驅入深、祁，陷易州，殺官吏，鹵士民。所過郡邑，攻不能下者，則俘取村墅子女，縱火大掠，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咸被其禍。上深哀痛焉。¹⁰⁷

以上百餘字雖然也提及曹彬之敗，但大部分其實是描述君子館戰役的後果。不過這段記載在《宋會要》中可以發現其淵源，《隆平集》和《宋史》也有類似的話，¹⁰⁸ 顯見其所本的官方史料中已有類似的描寫。可是宋軍對遼作戰失利並非首次，但過往史官或有隱諱不書之嫌（如高粱河戰役），或沒有加以重視（如瓦橋關戰役）。¹⁰⁹ 換言之，要到劉廷讓繼曹彬而覆敗之後，「河朔震恐」才成爲一件無可否認的事實。不論朝廷及前線軍士的信心士氣都受到了打擊，契丹之患才引起普遍的警覺。

在這種由前線至中央的普遍警覺之下，軍事已非純屬軍人獨佔的領域。因而文臣知軍事趨勢的加劇，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宋太宗原有宋琪、辛仲甫等專長軍事的宰相和參政，陳家谷戰役後又外放其謀臣張齊賢去代替楊業，可見文臣早已參與軍事。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君子館戰役後，出現了五位文官換秩爲武官的事。這就不是一般或臨時性的參與軍事，而是變換爲武官身分。太宗「欲並用文武，勘定寇亂，乃詔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許換秩」，於是雍熙四年鄭宣、劉墀、趙載、柳開和劉慶都換秩爲武臣。¹¹⁰ 柳

¹⁰⁶ 詔書見《宋大詔令集》卷一百八十五，頁675。《宋史·太宗紀二》端拱元年二月己亥：「詔瀛州民爲敵所侵暴者賜三年租，復其役五年。」（卷五，頁81）

¹⁰⁷ 《長編》，卷二十八，頁631。又《宋史·翟守素傳》云：「自劉廷讓敗于君子館，河朔諸州城壘多圯。四年，詔守素與田仁朗、王繼恩、郭廷濟分路案行，發諸州鎮兵增築，護其役。」（卷二百七十四，頁9363）

¹⁰⁸ 《宋會要輯稿》第一九六冊蕃夷一之一一亦載「士卒前後死者數萬人，沿邊諸郡創夷之卒不滿萬計，皆無鬥志」（頁7678）。此外，《隆平集·楊業傳》云：「三將繼衄，沿邊瘡痍之卒不滿萬計，料鄉兵城守，皆不習戰事，僅自固而已。」（卷十七，頁645）《宋史·劉廷讓傳》云：「自是河朔戍兵無鬥志，又料鄉民爲兵以守城，皆未習戰鬥。」（卷二百五十九，頁9003）

¹⁰⁹ 有關高粱河戰役，見曾瑞龍：〈宋遼高粱河戰役考論〉，《大陸雜誌》第八十卷第三期（1990年），頁106-7；瓦橋關戰役《國史·本紀》失載，見《長編》卷二十一，頁481注。

¹¹⁰ 《長編》，卷二十八，頁637。

開繼續進行策反遼將白萬德來收取幽州的活動，但到他調任全州，整個計劃便中輟了。¹¹¹

隨著形勢的惡化，主守戰略擡頭本屬意料中事。可是銳進輕敵的反面，又會帶來過激的畏敵傾向。雍熙四年朝廷本擬點集百姓，恢復大規模徵兵，宰相李昉的奏章中提到「近者分遣使傳出外料兵，自河東河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戎行。……臣等頗聞輿議，皆言河南百姓不同被邊之民，世習農桑，罔知戰鬥」。¹¹² 民兵欠缺訓練，未必有何用處，反而表露出朝廷驚惶失措的一面。結果文臣李惟清及陳王元僖上疏反對。¹¹³ 繼而，弭兵論在朝廷的影響力大增。殿中侍御史趙孚倡言求和，說「近則唐高祖降禮於突厥，啓三百年之宗社」。¹¹⁴ 適時爭取和平不失為理性的考慮，但把漢、唐開國都說成是連串屈辱求和的歷史，卻未免令人氣沮。當年年底，「雄、霸等州皆相告以敵將犯邊，急設備。寧邊軍數日間連受八十餘牒，知軍柳開獨不信，……既而果謀者之妄」。¹¹⁵ 可見其風聲鶴唳之狀。

事實上，遼軍的攻勢僅達魏博為止，並沒有立即威脅到開封的安全。本來遼軍乘著宋軍一再覆敗、士氣低落的機會向魏博以南作一個縱深衝擊，可能對宋室構成更大威脅。澶淵之役前，遼軍在關南遭遇挫折，強攻瀛州時死傷三萬多，還是企圖在縱深裏獲得決定性結果——這固然令宋人憂形於色，但遼軍也要冒前後受敵的風險。¹¹⁶ 君子館戰役後的形勢對遼軍似乎還要好，但他們為何沒有深入魏博以南？《遼史》耶律善補傳上記載了遼廷的一次軍事會議，會上許多將士說「魏城無備」，主張直取魏府。耶律善補出來反對，認為：「攻固易，然城大巨量，若克其城，士卒貪俘掠，勢必不可遏。且傍多巨鎮，各出援兵，內有重敵，何以當之？」遼廷於是打消了進攻魏府之想。上述文

¹¹¹ 《長編》云：「有白萬德者，真定人，為契丹貴將，……柳開因使說萬德為內應，擊幽州納王師，……使未及還，會詔徙開知全州，事遂寢。」（卷二十八，頁642）宋人筆記中多載此事，內容大同小異，因非本文關鍵，當另考之。

¹¹² 同上注，頁633-34。

¹¹³ 同上注。

¹¹⁴ 同上注，頁635。

¹¹⁵ 同上注，頁642。

¹¹⁶ 《東都事略·富弼傳》載富弼在遼廷之言：「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卷六十八，頁1030）此雖非確論，但澶淵之役時，寇準先已料到「傍城牽制，敵必懷後顧之憂，未敢輕議深入」（見《長編》，卷五十七，頁1267）；又澶淵定盟後，李繼隆認為「若會諸將襲逐，必立奇功」（見卷五十八，頁1293）；楊業之子延朗亦力言「願飭諸軍扼要路掩殺，其兵殲，則幽、易數州可襲取也」（見同卷，頁1297）。宋人認為容易殲滅遼軍，是一個有爭議性的問題。見柳立言：〈宋遼澶淵之盟新探〉，載《宋史研究集》第二十三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年），頁116，122-23。然無論如何，遼軍在澶淵之役時不能先殲關南宋軍，戰略形勢上存在後顧之憂，是相當明顯的。

字沒有標明年份，史傳中繫於歧溝關戰後。¹¹⁷《宋史·王承衍傳》記載：「雍熙中，出知天雄軍府兼都部署。時契丹擾鎮陽，候騎至冀州，去魏二百餘里。鄰境戒嚴，城中大恐，屬上元節，承衍下令市中及佛寺然燈設樂，與賓佐宴遊達旦，人賴以安。」可以發現魏府無備的情況。¹¹⁸

遼軍向博州進行了一次試探性攻擊。《長編》上記載著，博州監軍馬知節得悉君子館的敗訊後立即大修城壘，「既而敵果至，見有備，乃引去」。¹¹⁹ 遼軍的向南挺進就以此為終點。

另外，就戰爭的政治目的來說，遼的當務之急是保住燕雲。不少證據顯示，宋遼戰爭期間燕雲百姓常有向宋之心。高粱河戰役時幽州「民懷二心」，¹²⁰ 雍熙北伐時也不乏州縣守將降宋。後來柳開還打算策反遼將直取幽州。因此，經過連串兵火之後，遼人需要鞏固燕雲的統治。《遼史·耶律休哥傳》就記載「休哥以燕民疲弊，省賦役，恤孤寡，戒戍兵無犯宋境，雖馬牛逸于北者悉還之」，而以「自是宋不敢北向」來形容他的功績。¹²¹ 即使後來澶淵之役，遼人號稱為關南地而來，¹²² 但也沒有甚麼強有力證據指出他們要進一步奪取宋的江山。縱兵俘掠，奪取戰利品似乎是更為實際的利益——儘管遼太宗曾經有在中原稱帝的先例。當然，統治者的野心會隨著戰略形勢的發展而增加，一次又一次的勝利會導致戰爭的政治目的相應改變，這在歷史上屢試不爽。但君子館戰役並沒有帶來遼人大舉進軍中原的結果，一方面是遼方的戰爭目的似仍有限，另一方面，其軍事勝利還未夠徹底。

史實證明，宋軍沿邊兵不滿萬，皆「無復鬥志」含有一定誇張成分，或僅反映一個短期現象。首先，遼軍並沒有殲滅滄州都部署李繼隆的部隊，而李麾下的卻正是劉廷讓「緩急期相救」的「銳卒」。遼軍雖意圖殲滅雍熙北伐中連戰皆勝的定州都部署田重進所部，卻也沒有成為事實。至於宋軍的士氣雖然明顯受挫，但仍能回復。一年後的唐河

¹¹⁷ 《遼史·耶律善補傳》（卷八十四，頁1310）。

¹¹⁸ 《宋史·王審琦傳》附子〈承衍傳〉（卷二百五十，頁8817）。又《陳恕傳》云：「知大名府。時契丹內寇，受詔增浚城隍，其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恕立擒府中大豪一人，會將吏將斬之。宗族號愬，賓佐競前請救，大豪叩頭流血，請翌日集事，違期甘死。恕令械之以徇，民皆恐慄，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卷二百六十七，頁9199）由此可見魏州之危急。這段文字沒有年份，但傳的上下部分曾見「太平興國」及「淳化四年」字樣，似亦屬雍熙、端拱年間及淳化初年的事，可資參考。

¹¹⁹ 《長編》，卷二十七，頁626。

¹²⁰ 《遼史·耶律學古傳》（卷八十三，頁1304）。

¹²¹ 《遼史·耶律休哥傳》（卷八十三，頁1301）。

¹²² 《長編》卷五十八載澶淵之盟談判中，「契丹復以關南故地為言，〔曹〕利用輒沮之。……其按伴政事舍人高正始遽曰：『今茲引眾而來，本謀關南之地，若不遂所圖，則本國之人負媿多矣。』」（頁1290）。

會戰，定州監軍袁繼忠部下的易州靜塞騎兵，憑著高昂士氣，「摧鋒先入」，令「契丹騎大潰」。¹²³ 再過一年的徐河之捷，宋將尹繼倫以步騎千餘人突襲耶律休哥數萬大軍，戰前對部下說：「縱死猶不失忠義，豈能為邊地鬼乎！」於是「眾皆憤激從命」。結果這一戰打得休哥大敗，「自是不敢大入寇，以繼倫面黑，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¹²⁴ 這些都是宋軍士氣逐漸回復的跡象。此外，宋太宗又委派高級將領翟守素等主持河北諸州的城牆修復工程。「自劉廷讓敗于君子館，河朔諸州城壘多圯。〔雍熙〕四年，詔守素與田仁朗、王繼恩、郭延禧分路案行，發諸州鎮兵增築，護其役」。¹²⁵ 可見邊防設施也在相繼修復之中。

結 論

經過上文討論，現將陳家谷和君子館戰役的重要性概括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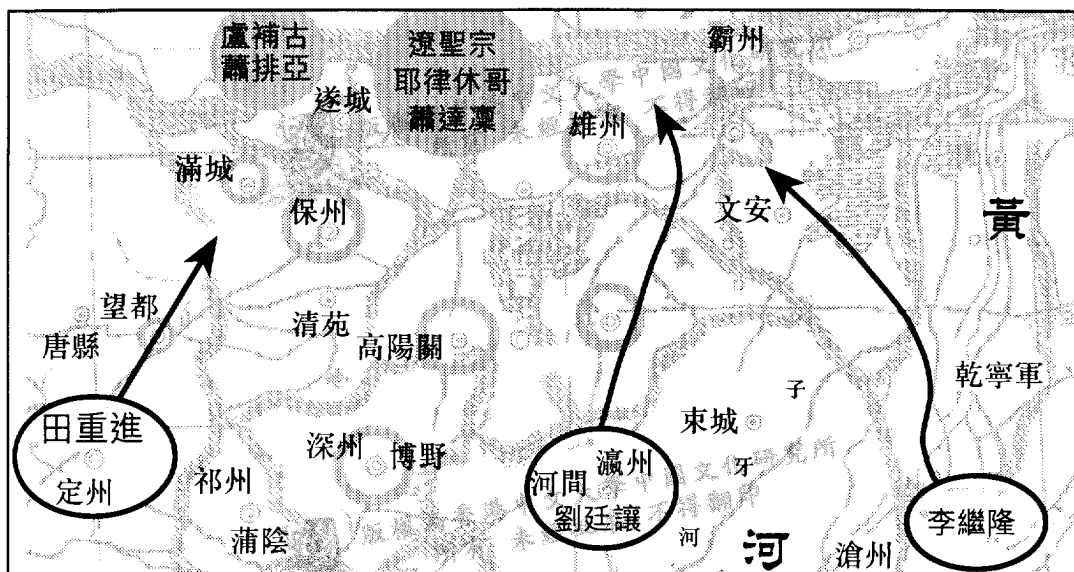
- 一、宋軍經過歧溝關戰役的失敗，既不能達成收復燕雲的戰略目標，還損失數萬兵員，撤回的軍馬短期內陷於建制混亂。可是，失敗並未立即引起普遍的警覺。到陳家谷、君子館戰役，名將楊業陷敵，宋軍又再蒙受劉廷讓數萬兵力的損失，於是出現一段時期士氣不振的現象。朝廷中弭兵論變本加厲，走到驚惶恐懼的另一個極端去。因而，歧溝關、陳家谷、君子館三場戰役應被看成宋遼戰爭戰略制導的過渡階段。這比僅視雍熙北伐為決定性失敗來得全面。
- 二、陳家谷和君子館戰役都體現出宋軍由攻到守的戰略轉型極不順利。從北伐回來的宋軍雖然分守前線各段，但宋的戰略和戰役領導層仍然受攻勢意識的影響，甚至有輕敵浪戰的傾向。宋軍完全採取防禦戰略，是陳家谷和君子館戰役以後的事。因此，機會主義（opportunism）對宋代軍事的不利影響值得重新探討。
- 三、遼人殲滅劉廷讓所部於君子館，是宋遼戰爭中極罕有的都部署一級的大單位被成建制地殲滅的例子。宋軍之所以遭受如此慘敗，除卻一般原因外，還由於戰役上流於正面抗擊；而其縱深戰術部署雖有減低戰鬥風險的作用，但所帶來較高的組織風險，使其缺乏應付突發事故的彈性。這可以為研究古代戰爭中的戰術對抗提供一個重要範例。

同時也應看到，遼軍雖掌握了戰略主動權，但以其有限的政治目的及長期戰爭潛力，加上失去殲滅田重進和李繼隆兩部的機會，宋軍要形成相持不下的局面，尚屬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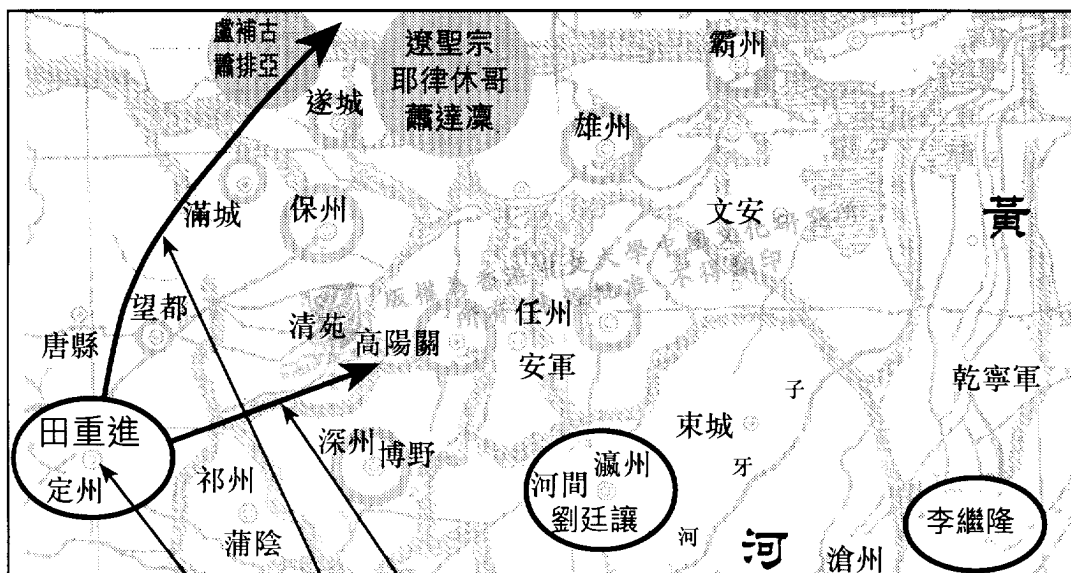
¹²³ 《長編》，卷二十九，頁658。

¹²⁴ 同上注，卷三十，頁682-83。

¹²⁵ 《宋史·翟守素傳》（卷二百七十四，頁93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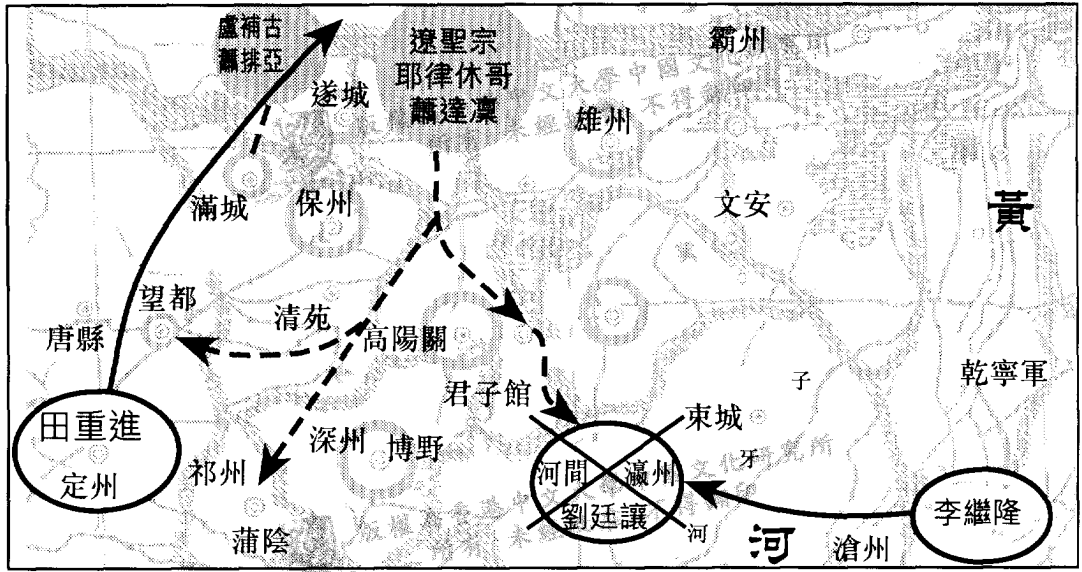


圖一：遼軍對宋軍重新發動攻勢的可能估計示意圖。地圖係將《中國歷史地圖集》宋遼金分冊頁17電腦素瞄後，刪去不相關地名及加上標號而成。



- 田重進第一個可能方案：向高陽關方向進軍
- 田重進第二個可能方案：自滿城方向反擊
- 田重進第三個可能方案：堅守定州不出

圖二：田重進對遼軍入侵的反應



圖三：君子館戰役——遼軍圍殲劉廷讓部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Song Strategic Transition from Offense to Defense: A Study of the Battle of Chen Family Pass and the Battle of Noble House (A.D. 986–987)

(A Summary)

Shui-lung Tsang

Scholars have long regarded the Second Youzhou Campaign (986) as the catastrophic turning point of the Song-Liao War (979–1005) but have rarely studied the Battle of Chen Family Pass (986) and the Battle of Noble House (986–987), both occurring shortly after the failed Northern Expedition. The Battle of Chen Family Pass has inspired Beijing Opera and other theatrical art forms, focusing more on the tragedy of the Yang Military Family than on strategy and tactics. Only a few general war histories in Chinese mention the Battle of Noble House but then only in a few paragraphs. The present author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account of these two crucial battles between the Song and the Liao in the second half of A.D. 986. He demonstrates the utility of strategy analysis in the study of premodern battles. Not only does he observ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high strategy, he also analyses such fundamental military aspects as operational arts and tactical employment.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view highlighting the military incompetence of Kaifeng,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se two defeats of the Song were largely due to an overemphasis on offensive operation and ignorance of the value of defense. Despite the lesson of the disastrous Northern Expedition, the Song transition of strategy from offense to defense was not accomplished until the Battle of Noble House. It is therefore more appropriate to regard the three campaigns — the Second Youzhou Campaign, the Battle of Chen Family Pass, and the Battle of Noble House — as an integral transition rather than to view the defeat of the Second Youzhou Campaign as the sole turning point of the Song-Liao War.